

文史资料选辑

第七辑



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

山东省昌乐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选辑

第七辑

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 山东省昌乐县委员会编

一九九八年七月

以史为鉴

振兴昌乐

刘明珂

中共昌乐县委书记刘明珂题词

以史为镜

教育后发

花兆贤

昌乐县县长花兆贤题词

搞好文史资料
服务经济建设

張懷安

昌乐县人大主任张怀安题词

弘揚愛國主義

振奮民族精神

杜介祥

昌乐县政协主席杜介祥题词

前 言

昌乐县政协主席 杜介祥

做好文史资料工作，是政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党爱国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方面。征集和出版文史资料，受益当今，惠及后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昌乐古称营丘，是西周初封姜太公于齐国的建都之地。昌乐历史悠久，文化璀璨，物产丰富，自古以来名人辈出，古迹遍布全县。特别是近百年来，昌乐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创造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本辑《文史资料选辑》，收录了我县部分革命史料以及文化、医药等方面的史料，读后会颇受教益，期望能够得到各界人士的喜

爱。

改革和建设的新形势，向人民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1995年，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座谈会提出：“客观地反映和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历史经验教训，帮助人们正确理解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推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建立，促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已经成为新时期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一项新任务”。因此，我们的文史资料工作，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紧紧围绕中共十五大精神，按照忠于历史、服务现实、古为今用的要求，积极搞好史料的征集和抢救工作，发扬爱国统一战线的优良传统，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昌乐，发展经济，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民族的繁荣昌盛而努力奋斗。

文史资料包括的内容很多，范围广泛，凡

有关我县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民族、宗教、文教、卫生等方面的重要事件、人物和历史文物，均在征集范围之内。特别是建国后的一些重要史料，亟待进一步挖掘、整理、出版。同时，改革开放的大潮，促进了我县经济的腾飞，其间涌现出了大量具有史料价值的事件、人物，需要抓紧征集，现在征集要比留待以后挖掘，内容更为丰富、生动、准确。我们殷切期望各位同志、朋友，特别是熟悉昌乐历史的老同志、文史爱好者，把个人“亲历、亲闻、亲见”的各种史料，秉笔直书，提供给我们，以资继续编纂好《文史资料选辑》。

值此《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刊印出版之际，谨向给予我们大力支持的昌乐党政领导、有关部门，以及积极提供资料 and 热情帮助工作的同志、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目 录

旭日东升耀方山

——记刘焕彩一家的革命活动

.....赵光海 (1)

历尽艰险 抗日捐躯

——记刘汉三烈士

.....高曰志 (20)

丹水颂英烈 方山立丰碑

——刘智堂革命生涯事略

.....肖文贞 秦修生 (36)

抗日战争时期的万庄和圈子

.....肖文贞 (48)

巩固新政权的斗争

.....韩文圣 (56)

昌乐县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赵光海 (70)

- 初春的步履
——记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李逢源
.....王庆荣 (80)
- 刘建事略
.....刘炳圣 (91)
- 昌乐县革命委员会“五·七”干校始末
.....徐春友 (99)
- 昌乐县烈士陵园迁建概貌
.....高瑞祥 刘曙光 (105)
- 解放前后的剧场与戏剧团体概况
.....于令珠 (114)
- 昌乐医药事业的沿革与发展
.....赵 健 (124)
- 昌乐名医王华村
.....赵守诚 (138)
-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关于营丘问题的
复信
.....赵守诚 (146)

昌乐县营丘故城考

.....阎其昌 (154)

昌乐县汉代画像石墓简介

.....李学训 (169)

有关朱翰仪宾的传说及史料

.....高玉忠 于令珠 (181)

旭日东升耀方山

——记刘焕彩一家的革命活动

赵 光 海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这是六十七年前，正当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向中央苏区进行军事围剿，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全国党的组织从中央到地方遭受严重破坏，中国革命逐步转入低潮的时候，而在方山脚下的昌乐县东耿安村一家门前挂着“旭日烟社”牌子的手工卷烟作坊里，十几名男女青年，一边手工制着纸烟，一边随着一个英俊的青年用脚点地打拍子学唱《国际歌》，这个青年人就是刘焕彩。这英勇悲壮的歌声激励着每个青年的革命斗志，也向敌人表

明，昌乐的共产党员、革命人民在白色恐怖下，面对敌人的屠刀，不妥协，不动摇，誓死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革命精神。昌乐党组织就是在这极其严峻的形势下，以“旭日烟社”为掩护，得到了秘密发展，坚持了革命斗争，它在中共昌乐地方党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

这家烟社是昌乐党组织创建人之一的刘焕彩在自己家开办的。刘焕彩，昌乐县五图镇东耿安村人，民主革命时期，在他的引导下，全家人参加革命，其兄弟5人中，4人加入中国共产党，两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出了年轻宝贵的生命。刘焕彩全家干革命，一门二英烈的英雄事迹，至今在昌乐人民中还广为传诵着。

刘焕彩，字云峰，1889年生于昌乐县东耿安一个农民家庭，他兄弟5人，排行老二。大哥刘焕章，三弟刘焕奎，四弟刘焕斗，五弟刘焕升。刘焕彩从小上学，天资聪颖，性情豪

放，机智果敢，不受封建礼教束缚，颇具反抗精神。18岁下学后，在清廷禁卫军服役，亲眼目睹了帝国主义联合瓜分中国，清政府割地赔款，屈膝求和。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相互勾结，层层盘剥劳动人民，进一步加深了中国人民的灾难。在这一严酷的社会现实面前，刘焕彩开始思索中国的命运和前途，决心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1925年，刘焕彩以他卓越的军事才能，在西北军冯玉祥部任骑兵团副团长。此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反帝爱国运动空前高涨，爆发了由上海学生发起的罢课反帝爱国运动，发展到工人罢工声势浩大的“五卅”运动，掀起了全国人民反帝斗争的高潮。刘焕彩在这场革命风暴中，深深认识到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多少仁人志士，为救国救民，前仆后继、英勇奋斗，曾爆发过洪秀全领导的

“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和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但都失败了。中国人民要彻底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地，求得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担当起历史的责任。他千方百计寻找党组织，经朋友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他回家探亲，为唤起家乡劳苦大众团结起来，与地方封建势力作斗争，先后在昌乐的解召、潍县的大柳树集镇上公开讲演，揭露帝国主义在“五卅”惨案中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宣传各大城市工人阶级反帝爱国的壮举，极大地吸引了当地群众，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1926年下半年，北伐战争节节胜利，我党为了取得北伐的彻底胜利，郑州市委派遣刘焕彩，通过地下党组织，打入军阀高树勋部任职，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寻机策动官兵起义，开展兵运工作，以配合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

1927年秋，作为郑州市委负责人之一的刘焕彩再次回家探亲。在家逗留期间，正逢曾在省立一师加入党组织的孟繁锬在昌乐中部淳于一带，宣传共产主义，开辟党的工作。二人是姑表兄弟，关系密切，频繁接触，共同探讨马列主义理论，分析时局，商讨昌乐建党大计。二人经常在大街上公开宣传共产主义，教青年学唱《国际歌》，联系社会现实讲解歌词，广泛传播马列主义，为昌乐地方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为了把家乡劳苦大众引向革命道路，刘焕彩首先在亲兄胞弟中培养积极分子，在他的启发教育下，其三弟刘焕奎、四弟刘焕斗经常阅读他保存的《政治经济学》、《布尔什维克》等进步书刊，主动提出入党要求。不久，刘焕彩首先发展刘焕奎入党。并对刘焕斗积极进行培养，协助刘焕斗利用其教村学的方便条件，在本村创办平民夜校，刘焕斗白天教村学，晚

上教夜校。夜校的学员都是穷苦农民子弟，极易接受革命宣传。刘焕彩以《平民千字课》为教材，联系本村财主“天心堂”趁荒年放高利贷发家的例子，向学员讲解穷人是怎么穷的，富人是怎么富的，深入浅出地阐述什么是阶级、什么是剥削的革命道理，在当地穷苦农民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刘焕彩的共产主义宣传直接动摇着封建势力的统治基础，国民党昌乐当局如坐针毡，在一伙反动势力的干预下，平民夜校于次年被迫停办，但共产主义思想在东耿安却得到了进一步传播。

1928年9月，刘焕彩在高树勋部因策动一个连的官兵起义败露而被捕，后经冯玉祥部军官刘岩丰保释，被“礼送出境”。他几经辗转，又回到家乡，继续从事地方党的创建工作，发展小解召小学教员刘慈源、西耿安窑工刘效增二人入党，建立了中共耿安支部，刘焕彩任支部书记。1929年3月，中共昌乐中心区委根据

潍县县委指示，下设淳于、耿安两个分区委，刘焕彩任耿安分区委书记，不久，吸收为中心区委委员。

耿安分区委建立后，东耿安成为昌乐党组织活动的重要基地，中心区委负责人孟繁锬、赵西林，常来东耿安秘密聚会，召开党的会议，政治交通员杨勋普、尹宗礼等，往返于潍县中心县委和昌乐的淳于一带，也常来东耿安落脚，党的活动十分活跃。为防止引起敌人怀疑，便于秘密开展党的工作，刘焕彩与其兄弟5人，在自己家中开办“旭日烟社”，借制作推销纸烟掩护党的活动。大哥刘焕章主持家务，主动腾出房子，筹措资金，积极支持刘焕彩的革命活动。多次要求入党的刘焕斗，为了表示对革命有所贡献，利用养蜂手头比较宽裕的条件，主动去潍县下河街石印局，精心制作了“旭日牌”烟盒。烟盒的图案是，在鲜红的旭日二字下，由陡峭的海岸，汹涌的大海，浓重的残云，

火红的旭日和灿烂的霞光组成。象征着风起云涌的革命形势和共产党人扭转乾坤的坚定信心。“旭日烟社”开张以后，淳于的党员以送菸叶的方便条件，来东耿安与刘焕彩联系党的工作，刘焕彩与政治交通员尹宗礼肩背卷烟木箱奔走四方，积极从事党的工作。是年，刘焕彩又发展年过半百的大哥刘焕章入党。

1931年6月，中共昌乐特支建立，刘焕彩任特支委员，兼耿安分区委书记。为了扩大党的后备力量，刘焕彩积极从事共青团的创建工作。他以“旭日烟社”为基地，向做工的青年男女讲述苏维埃儿童团斗争的故事，在青年中教唱《国际歌》、《少年先锋队歌》和《妇女放足歌》。这些青年大部分是穷苦农民子弟，容易接受革命宣传。在刘焕彩宣传教育下，先后有刘龙骧、刘龙图、刘龙田等14名青年入团，共青团昌乐特支建立，刘焕彩之子刘龙骧任特支书记。

由于刘焕彩的积极工作，耿安分区委党的组织有了进一步发展，辖东、西耿安和解召3个支部，党员发展至22人。在当时的昌乐和潍县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党的活动几乎半公开，耿安被誉为“小莫斯科”。刘焕斗自己出钱，从天津大公馆邮购“苏俄视察记”，订购“北京庸报”等进步书报，对全国革命形势消息非常灵通，如中央红军反围剿取得了胜利，活捉国民党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打垮孙连仲部，都是通过耿安传遍昌乐各级党组织的。耿安党组织的日益壮大，引起了地方反动势力的惶惶不安，他们密告国民党昌乐当局，声称烟盒上的“旭日”二字是9月9日共产党武装暴动的信号。1932年8月18日凌晨，国民党昌乐县党部委员邵德初，兼承其主子旨意，带领30多名军警秘密包围了“旭日烟社”。刘焕彩凭着他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思想早有警觉。此时，他正早起推煎饼，透过门缝，朦胧发现墙外有

警察在晃动，他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于是，迅速从后门出走，跑到场园，找到正在压场园的儿子刘龙骧，从背后拍了他一把，压低声音说：“龙骧，县公安局来抓我，我走了。告诉你三叔，他也要先躲一下。”刘龙骧回头一看，转眼就不见人了。刘焕奎闻讯后，乘敌人不备，翻越围墙，先藏到邻居刘春起家地瓜井里，盖上秫秸，躲了一天，尔后去了潍县。刘焕彩脱险后，经解召村，找到刘慈源说明情况，交待了一下党的工作，又赤脚跋涉 20 余里，至北岩村南野外坟地，得到淳于分区委党组织接应。然后辗转济南，奔往郑州，历尽千辛万苦，通过地下党组织，与郑州市委接上联系。接着，投入了京汉铁路的工人运动，负责京汉铁路北京至石家庄一段的工人领导工作。在斗争中，他立场坚定，不畏艰险，机智勇敢。1933 年秋，在组织京汉铁路工人武装暴动的斗争中，不幸壮烈牺牲，年仅 44 岁。刘焕彩同志是中国共

产党优秀党员，昌乐党组织的主要创建人之一，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的英雄形象和革命事迹，永远活在昌乐人民的心目中。

敌人没有抓到“旭日烟社”的主要人物，就把刘焕章、刘焕斗、刘龙骧带走了，押至昌乐县公安局。第二天，被戴上手拷脚镣投入监狱。在狱中，刘焕章、刘焕斗虽被多次严刑审讯，二人坚贞不屈，互相鼓励，随机应变，多方应付，坚守党的秘密。敌人看到刘龙骧年龄小，重点向他施加压力，逼他说实话。刘焕斗嘱咐他，不管敌人怎样折磨，要咬住牙，绝不能吐露实话。刘龙骧虽遭多次严刑拷打，脊梁都被皮鞭抽黑了，但他咬紧牙关，无论敌人问什么，他只有一句话：“不知道。”敌人搞不到口供，抓不到任何把柄，将他们关押3个月，弄了个“保释候审”，无奈释放。狱中3个月，刘焕升为了营救亲人，上下求保，探监往返。

花费大洋一千，卖地 10 大亩，为了革命，在所不惜。

敌人破坏了“旭日烟社”后，在全县实行白色恐怖，疯狂破坏党的组织，妄图将共产党员一网打尽，随后相继逮捕了昌乐特支书记孟繁锬，小解召党支部书记刘慈源和杨家淳等共产党员及革命积极分子 20 多人，昌乐党组织自创建以来，遭受敌人空前大破坏，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隐蔽斗争，并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党的活动一度陷入低潮。刘焕奎对党的工作放心不下。不久，他从潍县秘密回到昌乐，与特支委员赵西林、党员骨干武克东取得联系，继续领导党的秘密活动。刘焕奎的家成为党的秘密活动主要联络点，接送过许多党员同志。刘焕奎的妻子负责站岗放哨，还要负责做饭，有时深更半夜起来做饭，经常一天做到六顿饭。为了防止邻舍引起怀疑，做饭时，把烟囱堵起来。家贫无粮，有时犯难，刘焕奎幽

默地劝导她说：“天上有菜，地上有菜，谁说没吃的？”她炸上野菜，拌上咸盐给同志们充饥，或糊成菜饼子给大家吃。在这样艰苦的生活环境和险恶的革命形势下，共产党的传单从刘焕奎的家里印刷出来，撒遍昌乐大地。敌人只见传单不见人，于是悬赏缉拿，扬言谁捉住一个共产党，赏小米一千斤，大洋一百元。刘焕奎从入党那天起，就做好了为党的事业不惜牺牲个人一切的思想准备，他不妥协，不动摇，继续坚持党的地下斗争。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昌乐党组织在抗日救亡运动中重新恢复和建立起来。为迎击日军侵略，刘焕奎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写标语，撒传单，宣传我党抗日主张，筹建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刘焕奎接受党的委派，去昌邑何凤池领导的七支二大队参军。他奔走多日，在当时做七支二大队组织工作的庄鹤云家找到何凤池，接受何的任务，到潍县西乡去拉夏泽浦、

范启颀、刘承启的队伍，一块联合抗日。后因刘、范都是土匪队伍，夏是寿光土豪张景月的人，结果没拉成。刘焕斗又回到七支二大队参军入伍。不久，由支队组织干事刘慈源和大队指导员田仲睿介绍入党。其后，随部队转战南北，屡立战功。建国后任山东省农林厅畜牧处处长，1976年病故。

1938年1月，日本侵略军侵占昌乐城。国民党昌乐县长王金岳弃城南逃。日军在铁路沿线和重要集镇建立了8处统治奴役昌乐人民的据点。昌乐党组织积极筹建抗日武装，奋起抵抗。6月，刘焕奎代表昌乐党组织，写信要求在八支队工作的赵西林、刘慈源回昌乐领导抗日斗争。下旬，赵西林、刘慈源应刘焕奎的要求，经八支队司令部同意回到昌乐，与刘焕奎一起，宣传发动群众，组建“抗日救亡团”。不到3个月，“抗日救亡团”发展至500余人，遍及耿安、毕都、淳于等十几个村子。9月，

在昌乐，“抗日救亡团”发展壮大基础上，八支队派遣军事干部庄少云、郭家瑞二人到昌乐，帮助组建“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第八支队第二十九大队”。刘焕奎成为组建部队的重要成员。庄、郭二人来到昌乐后，在刘焕奎家几次召开有赵西林、刘慈源、刘焕奎参加的拉部队的秘密会议，传达八支队指示，研究组织二十九大队的具体事宜。刘焕奎发动全家为其提供食宿，站岗放哨，为这支部队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9月13日夜间，二十九大队在东耿安刘焕奎的场园里宣布成立，刘焕奎带领“抗日救亡团”团员刘宝太、刘汝元、刘松林等人，携带土枪、大刀首批入伍，并发动本村群众，捐献粮食，安排食宿。东耿安成为二十九大队的主要活动基地，保证了这支年轻抗日队伍的生存和发展。二十九大队建立后，同日军进行过数次战斗，后编入八支队。

1938年12月底、中共昌乐县委建立，辖

四个区委，刘焕奎与刘智堂负责第四区委工作。1939年9月，县委书记刘慈源被敌杀害，组织部长赵西林去地委汇报了昌乐县委遭敌破坏的情况。地委领导指示：敌伪顽势力统治越严的地方，群众遭受的痛苦越深，只要有立足之地，就不能放弃党的工作，要重建昌乐县委。下旬，赵西林、刘焕奎、武克东在东耿安刘汝元家召开党员会议，传达地委指示，重建昌乐县委，赵西林任书记，刘焕奎任组织部长，武克东任宣传部长。

1940年上半年，国民党昌乐顽固派张天佐，重划行政区域，在全县实行保甲制度，采用五家连坐手段，严密监视和秘密侦察共产党的活动，派出特务、暗杀团，以枪杀、活埋、“砸核桃”等残酷手段，先后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50余人。县委书记赵西林去鲁中区党委汇报了昌乐的革命斗争形势。区党委书记霍士廉、宣传部长高克亭指示：为避免敌人的进一

步屠杀，保存革命力量，已经暴露的同志可到根据地来，未暴露的同志转入地下，秘密活动。决定赵西林留鲁中党校学习，武克东调二地委宣传部工作，昌乐县委的工作由刘焕奎、刘智堂二人负责，转移到潍县、昌乐的边沿区，领导群众，开展斗争。在这险恶的革命形势下，刘焕奎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继续领导昌乐的地下党员，坚持革命斗争。11月8日，刘焕奎奉地委指示，去临朐参加干部训练班，他从潍县回到家中向妻子告别。妻子知道他要出远门，流着泪担心地说：“听说国民党要在一个月內，将你们这样的人杀绝，你可要小心啊！”刘焕奎从入党那天起，就做好了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牺牲的思想准备，他给妻子擦了擦眼泪，语重心长地说：“天下是打下来的，地是一寸一寸夺来的，如果我牺牲了你不要带孩子走，把孩子抚养大，接过革命的班，把革命进行到底。”没想到，就在这晚的下半夜，张天佐的保安团

团长刘耀文带领一个连，包围了刘焕奎的住宅，由伪保长刘明功带路，破门而入，抓捕刘焕奎。刘焕奎知道难逃敌人的魔掌，从容不迫地穿上衣服，毫无惧色地走了出来。“给我捆起来！”刘耀文一挥手，声嘶力竭地喊，几个匪徒一拥而上。“不用捆，我自己会走，革命者不怕死！”刘焕奎镇静自若地说。几个想动手的匪兵，战战兢兢地向后退了几步，不敢近前。刘焕奎泰然自若地走出大门，这伙匪徒尾随其后，走出村头，行至村西头的河滩上，刘焕奎知道敌人要下毒手了，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这口号犹如春雷，响彻在夜深人静的东耿安上空，敌人惊惶失措，慌忙开枪，刘焕奎壮烈牺牲。刘焕奎同志那种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威武不屈、大义凛然的英雄形象，永远留在人民的心里。

刘焕彩一家全家干革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一门二英烈的

革命精神和英雄事迹，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深切怀念他们。

历尽艰险 抗日捐躯

——记刘汉三烈士

高 日 志

提起抗日，昌乐人民自然就会联想到被马保三委任为营长的刘汉三。他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两次拉起抗日队伍与日军、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曾几次被国民党、土匪扣押，都虎口脱险；1938年12月，被国民党昌乐县长张天佐密谋杀害于临朐县小桃花村，时年32岁。

识马列光荣入党

刘汉三，原名刘九鼎，字汉三，1906年出生于昌乐县鄌鄌镇南村的一个农民家庭里。刘汉三祖辈务农，到父辈上，父亲刘玉堂学会

了中医，家庭开始靠开中药铺维持生活。刘汉三兄弟两个，学习都很好。刘汉三从小性格豁达，主持正义。父亲很喜欢他，所以极力供他上学，望将来继承家业。刘汉三在私塾就读，成绩十分突出，1927年8月考入济南育英中学。在济南学习期间，正是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工人罢工、农民暴动持续不断；师生中间，马列主义思想已秘密传开。受形势的影响，刘汉三对马列主义有了初步的认识，对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产生了责任感。

1930年8月，刘汉三从济南中学回到昌乐。当时，在中共昌乐中心区委（1931年6月改为特支）的领导下，昌乐党的活动非常活跃。中共党员刘焕彩与刘焕奎在东耿安办起了“旭日烟社”；中心区委书记孟繁锬在北展创办北展高级小学；淳于分区委书记赵西林在赵家淳于开办“华兴成油坊”。刘汉三看到昌乐党组织发展如此之快，很受启发，便主动与赵西林取

得联系，把父亲的药铺作为鄆鄆一带中共党员活动的联络点，开始在群众中宣传进步思想。

1932年，昌乐国民党政府开始逮捕、暗杀共产党人。8月，中共昌乐特支遭破坏，特支书记孟繁锬被逮捕。同月，刘汉三被以共产党嫌疑的罪名扣押于昌乐监狱。无论敌人怎样严刑拷打，刘汉三始终没有泄露党的秘密，与敌人巧妙周旋。刘汉三的父亲上下花钱，求人担保。国民党当局看他是一个刚下学的学生，又没掌握证据，就将其释放。父亲本想叫他安心学医种地，但刘汉三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赵西林要求工作。

为了保存进步力量，受赵西林安排，刘汉三来到潍县城月河崖，以做蜡烛为职业，掩护党的工作。当时，昌乐党员钟道功已转移到潍县城东关一所小学里，以教学为掩护，进行党的工作。刘汉三的联系入就是钟道功，与钟道功取得联系后，他的任务是配合钟道功宣传共

产党的主张，负责昌乐和潍县党员的某些联系工作。

1932年12月，刘汉三由钟道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刘汉三经常夜间到潍县城南的茂子庄、庄家、大寨一带进行党的宣传工作，为昌乐党组织和潍县党组织的联系起到了重要作用。

斗土匪为民除害

1935年，刘汉三从潍县到高崖一带联系工作，回来的路上，在徐家庄村前，被土匪头子王化平以共党嫌疑为由扣押。刘汉三被扣在金山村西沟的一个枯井里，有两个土匪看守。他们准备天亮后，向国民党政府请功领赏。刘汉三家中花钱赎人，土匪说：“只要命，不要钱。”夜里，刘汉三在井底摸黑将绳子磨断，爬上枯井，一口气跑回家。刘汉三的父亲叫着汉三的乳名说：“你回来干什么？人家想要你

的命，还不赶快跑！”刘汉三扭头跑向高镇岳父赵仁怀家中。刘汉三刚离开，王化平就带领一帮土匪包围了刘汉三的家，翻腾了一阵，把汉三的父亲骂了一顿，又赶到了高镇。这时，刘汉三已带好藏在岳父家中的手枪，赶往潍县月河崖去了。王化平一看刘汉三跑掉，深知大事不好，便离开郟郟，跑到青岛躲避。

1936年春节刚过，腊月的冰凌还没有融尽，刘汉三和刘明铎（共产党员）便迎着料峭的寒风，赶往青岛。刘汉三打扮成商人，头带礼帽，身穿黑色长衫，看上去真象一个精明的老板。刘明铎装成管家，紧随其后。两人在青岛下店后，早出晚归，寻找王化平的下落。这天，在青岛西郊的一家二层酒楼上，看到了王化平，刘汉三和刘明铎暗递眼色，在王化平不远的一张酒桌前坐了下来。王化平认出了刘汉三，急忙向窗口方向躲去。刘汉三随后跟了过来，王化平知事不妙，破窗跳出。刘汉三立即跟出，

在楼下扭打在一起。当围观的群众来到楼下，刘汉三和刘明铎已杀死王化平，消失在人群中。

拉队伍身陷囹圄

1936年5月，昌乐中西部地区逐步恢复党的活动。刘汉三和钟道功按照中共昌乐党组织的指示，回到钟家后沟一带活动。当时，国民党当局层层设立土地陈报机构，向农民摊派名目繁多的陈报费用。刘汉三和钟道功秘密发动群众，写标语，拔牌子，使土地陈报不得不半途而废。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9月23日，蒋介石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压力下，发表了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和两党合作抗日的谈话。刘汉三和钟道功在郟郟一带开始酝酿抗日队伍。刘汉三在潍县时，就有拉队伍的打算，先后搞了四支手提式手枪，一支“德国造”。12月底，刘汉三在郟郟街组织起

了60多人的抗日别动队第三十二大队，名义上归张天佐领导。抗日队伍拉起后，一方面把社会上的闲散枪支集中起来，一方面宣传抗日。

三十二大队的迅速发展引起国民党昌乐县长张天佐的极大恐慌，从饥养到枪支对三十二大队百般刁难。刘汉三为了保存抗日力量，保护好昌乐县人民的财产，于2月4日，在三十二大队的驻地鄆鄆三官庙与赵西林、孟繁锸、孟千里等拉起的“山东省第八区抗日别动队第十七大队”合编。刘汉三任副大队长。

两支抗日武装合编后，干部战士的情绪高涨，很多群众带枪参加队伍。武装的不断扩大，使张天佐坐卧不安。3月23日，张天佐以昌乐县长和游击第四区总队长“点名发饷”为名，通知十七大队到北展街小学集合。当时，在队的主要领导是孟千里和刘汉三。孟千里深知张天佐的奸诈，不同意集合队伍。刘汉三认为：我们拉队伍是张天佐同意的，怎么也不会做出

破坏抗日的事。刘汉三便带了40名战士前往北展集合。

路上，刘汉三的结拜兄弟、卫队长张思昌提醒刘汉三说：“这次去凶多吉少，要防备着点，看事不好。早下手。”刘汉三说：“他要枪就给他，没有枪再搞。”

来到北展小学，刘汉三看到国民党员刘世隆的队伍也在那里（早知内幕），便更放心地带队进院。张思昌总觉有鬼，便站在了靠墙的位置，两支手枪藏起了一支。

队伍刚站好，张天佐以验枪为由，下令将子弹退膛，紧接着命令“下枪”。下枪使刘汉三大吃一惊，但为时已晚。张天佐的100多名士兵蜂拥而上，收缴了抗日战士的武器。刘汉三被团团围住已无计可施。张思昌眼疾手快，掏出手枪对准张天佐就是一枪。张天佐的卫队长于介成上前保护，正中心窝丧命。张天佐大吃一惊，慌忙下令捉拿。张思昌已飞身上墙，

消失在村外。郑太平等7名战士刚要反抗，被当场打死。其余战士全部被押。

刘汉三被押到国民党县政府驻地仓上村。张天佐没有给刘汉三上刑，本想让其跟自己干，曾对刘汉三说：“我干总队长，你干分队长。”刘汉三回答说：“我宁给皇帝牵马坠蹬，不给王八当祖宗。”张天佐见刘汉三的态度非常强硬，就把他押在仓上监狱里。

刘汉三被扣后，中共昌乐党组织做了大量营救工作。刘汉三的入党介绍人钟道功，结识了共产党打入国民党第69军张汉泉部的蔡贯卿同志。当时，蔡贯卿正在淳于、毕都一带宣传抗日，组织“抗日自卫团”。蔡贯卿以国民党69军连指导员的身份，亲自找到张天佐，讲国共合作抗日的道理。张天佐表面上答应放人，内心害怕刘汉三出来拉抗日队伍，所以两个多月不放也不杀。

5月底，日本军扫荡仓上，张天佐率队来

到了朱汉乡野鸡沟村一带。刘汉三被扣在一家农户的地窖里。刘汉三的父亲和钟道功花钱买通了张天佐的参谋赵子良。赵子良想暗放刘汉三。一天夜里，刘汉三越墙逃跑。看押人鸣枪，洋装追赶。刘汉三当夜赶回郟郟，找到了钟道功。

再抗日为国捐躯

为防张天佐的抓捕，刘汉三没在钟道功家停留，住到了郟郟镇高镇村赵锡珍家里。赵锡珍专门为刘汉三提供了一个房间，外人和家人都不准进入。刘汉三与中共昌乐县委的联系只通过钟道功。钟道功当时的合法身份是钟家后沟的教员。

1938年6月中旬，村民们正忙着打场晒麦的时候，钟道功深入黄县一带，找到了八支队。向马保三汇报了昌乐县的抗日形势，诉说了张天佐破坏抗日，扼杀十七大队，迫害刘汉三的

情况。八支队司令马保三对张天佐的罪恶行径非常气愤，对昌乐县人民的抗日决心深表支持。他分析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形势和前途，要求钟道功回到昌乐继续组织抗日武装，并委任刘汉三为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独立营营长，当场签发委任状，落款日期是“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六日”，盖有马保三的印章。

钟道功回到昌乐向刘汉三秘密传达了马保三的指示，商谈了建立抗日武装的计划。刘汉三接到委任状后，抗日决心更大，为了少与张天佐产生磨擦，来到安丘、临朐、昌乐三县界首的于家洼一带，以“国民党 69 军特务大队”为名，又建立起一支抗日武装。不到 3 个月队伍就发展到近 200 人。刘汉三任特务大队队长，也有的称他营长。路大山、张思昌、韩明理做警卫。刘汉三的堂弟做内勤。临朐县安家沟村的崔化善任副大队长。下设两个连由崔化善和吉山沟村的王景云任连长。

11月，马保三的大部队，在淄博一带活动。刘汉三带领抗日队伍在于家洼一带，一方面宣传抗日，一方面训练队伍，筹粮扩枪等待八路军到来。

刘汉三手下的两个连长崔化善、王景云在加入抗日队伍前都干过土匪，性格粗鲁，行为不规，并与昌乐国民党县长有联系。崔化善、王景云对抗日部队的艰苦生活很不习惯，经常到周围村中侵害百姓。一天，刘汉三的勤务兵刘义友找崔化善、王景云有事，无意中走进了一个小楼的二层房间，突然发现楼上藏着一个被绑的小孩。崔化善、王景云慌忙截住刘义友，气恼地说：“进门也不通报一声，干什么的。”刘义友赶忙退出，把情况报告了刘汉三。刘汉三把崔化善、王景云叫到队部，问起此事才知道：那被绑的小孩是崔、王二人到南沂蒙一带架的“票”。刘汉三对崔化善、王景云进行了批评教育，指出架票是土匪行为，这样做违犯

了部队纪律，是非常错误的，并要求以后无论生活多么苦，也不准侵害百姓。崔、王二人口头上承认了错误，心里很不高兴。崔、王并不知道这是一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他们本想参加队伍吃喝玩乐方便。后来，崔、王对刘汉三与共产党的关系有所耳闻，所以对刘汉三更加不满，并开始与张天佐取得联系。张天佐对刘汉三又怕又恨，一直在找机会加害于他。崔化善、王景云与张天佐臭味相投，便开始密谋杀害刘汉三。

12月，马保三率领八支队，从清河地区过胶济铁路沿淄河南下，来到临朐县的辛寨一带。这天，马保三通知刘汉三在辛寨镇附近的南流村开会。刘汉三按时到达，与马保三研究了归队的事宜。刘汉三平日外出都带双枪，这次德国造匣子枪被他的堂弟私下拿走（受崔、王的教唆），开会结束，他当晚跋涉30多华里赶回于家洼村。

刘汉三刚一进门，发现崔化善、王景云、张世昌都在等候，觉事不好，但洋装不知，让勤务员去准备饭菜。就在这吋，刘汉三的疟疾病复发，浑身抖作一团。王景云、张世昌趁机上前抓捕刘汉三。刘汉三掏出手枪还没打响就被绑了。崔化善下令把刘汉三关押在营部，把不知内幕的警卫员全部下枪解散。当晚，崔化善宣布：“未经允许任何人不得入内”。第二天，崔化善带队向崔家河转移。队伍在崔家河驻了两天，又转移到了小桃花村。转移的路上，刘汉三赤着脚，脚上磨破了皮，鲜血直流，一步一个血印，但豺狼成性的崔化善等人，不让任何人靠前。连冻带磨，刘汉三的双脚已皮肉不分。

崔化善、王景云一伙叛徒对刘汉三看押很严，只允许于世平送饭，不允许外人接触。在小桃花村的第四天夜里，刘汉三磨断绑绳向外跑，被崔化善抓回，当场把腿砸断。刘汉三拖

着伤残，汗珠子从额上滚下来，但没求告一声，只是破口大骂。

抓回的第二天晚上，崔化善一伙把刘汉三架到小桃花村的西沟里，威逼他与共产党断绝来往，投靠国民党昌乐县长张天佐。无论怎样折磨，刘汉三始终不答应。一伙叛徒面对这一坚如钢铁的共产党员，无可奈何，最后施行了惨无人道的手段，用绳子把刘汉三活活勒死，浅埋于沟旁的一棵桑树下。

刘汉三被害以后，崔化善、王景云带队投靠了国民党昌乐县长张天佐，队伍拉回了于家洼附近的洛车埠村。八支队得知刘汉三被害的消息后，立即决定攻打洛车埠，惩治判徒，夺回人和枪。攻打洛车埠的战斗，即将胜利时，张天佐的部下刘世龙率精锐部队来打增援。崔化善、王景云率部逃进了张天佐的封锁区。

年仅 32 岁的共产党员刘汉三被国民党、土匪密谋杀害，但他忠于党，忠于人民，抗日

保国的革命热情，将永远激励着人们去开创未来。为了纪念他，1989年3月14日，经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追认刘汉三同志为革命烈士。

丹水颂英烈 方山立丰碑

——刘智堂革命生涯事略

肖文贞 秦修生

昌乐山青水秀，名胜颇多，风景最佳者当数县城东南十公里的方山。这山，高大巍峨，青松翠柏，山顶方平如砥，宛若一座硕大的无名丰碑，矗立于昌乐大地。方山脚下，有一条九曲十八弯的小丹河。这河，源远流长，历史悠久。传说是由上古尧帝施丹朱于河中而得名。在依山傍水处有一个小村庄，名曰下庄，一八八八年，昌乐县早期的优秀共产主义战士刘智堂烈士就出生在这里。半个多世纪以来，刘智堂为人民解放事业英勇献身的光辉事迹，在鲁中地区广为传颂，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而奋斗。

刘智堂世代为贫苦农民，祖祖辈辈受尽封建势力的压迫。他的父亲饱尝了穷人没有文化的苦头，全家节衣缩食，竭尽全力供智堂一人读书。他入塾后，深知自己求学不易，生活俭朴，勤奋好学，学业优异。求学期间，他兴趣广泛，涉猎各种知识，尤其酷爱中华传统医学，这为他以后以行医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打下了基础。

一九一七年，刘智堂下学后，在当地长期从事教学生涯。他学识渊博，为人诚实，同情穷苦农民，深得当地群众拥戴，是昌乐县颇有影响的知识分子。

一九二六年以后，昌乐早期党员孟繁锸和曾在冯玉祥部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刘焕彩，在昌乐宣传马列主义、共产主义学说，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在穷苦农民中引起强烈反响。刘智堂深受影响，他逐渐认识到，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民族要独立，人民

要解放，就必须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他初步萌发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想。毅然决然地参加了革命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全面进攻中国，很快吞并了大半个中国。他们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做。国民党集团内政腐败，贪官污吏横行乡里，鱼肉人民。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深入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迎击日寇侵略。

一九三八年八月，昌乐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救亡团”群众组织不断壮大，发展到五百余人。为了加强党对群众武装的领导，昌乐党组织主动派交通员与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队第八支队联系。八支队应昌乐党组织的要求，派庄少云、郭家瑞二人到昌乐，帮助昌乐党组织将“抗日救亡团”改编成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队第八支队第二十九大队。庄、郭二人到昌乐后，

召开了两次党员积极分子会议，刘智堂作为先进党员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传达了八支队的指示，研究了成立二十九大队的具体事宜。

九月十三日深夜，在东耿安村刘焕奎的场院里，点燃油灯，村口布置了岗哨，各村参军的青年，有秩序地秘密汇集到场院里。刘智堂自带匣枪一支，率领本村“抗日救亡团”积极分子十六人，抬着“老母猪炮”扛着抬枪，拎着大刀片，赶来参加二十九大队成立大会。大队成立后，根据八支队指示，庄少云任大队长，郭家瑞任指导员，刘智堂与刘慈源、赵西林一起负责大队党的工作。二十九大队的成立，引起了国民党昌乐当局的不安，进而遭到地方顽固派张天佐的种种刁难和排挤，部队吃饭都成了问题。为了使部队得以生存和发展，刘智堂主持拟定了《告昌乐同胞书》，组织抗日宣传队进行宣传，印刷传单在全县广为散发。十二月一日（农历十月初十）北展庙会，刘智堂登

台做慷慨激昂的抗日演讲，讲述二十九大队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为了把日寇早日赶出中国去，我党坚持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号召全县人民有人的出人，有枪的出枪，发展壮大自己的队伍，打败日本侵略者。他边演讲边呼口号：“国共合作一致抗日！”“誓死不当亡国奴！”“坚决反对投降派！”他的演讲，震慑了地方投降派，教育了广大群众。当地农民将自己省吃俭用的粮食偷偷地送到二十九大队，很快解决了给养困难，挫败了张天佐企图将二十九大队挤走、饿跑的阴谋。

随着二十九大队的不断壮大，张天佐恐惧不安，他以二十九大队“扰乱社会治安”为名，限令二十九大队离开昌乐境。为顾全大局，避免内战，保存革命力量，二十九大队决定向八支队驻地转移。刘智堂随部队转移编入八支队。八支队司令部根据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派刘智堂再回昌乐，一方面继续开展党的工作，

秘密发展党员，扩大党的组织，另一方面积极动员昌乐青年去八支队参军，支援抗日根据地的建设。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底，中共昌乐县委建立后，辖四个区，刘智堂同志任第四区委书记。下半年，张天佐实行法西斯统治，大量发展反动党团，监视群众，侦察共产党的活动，捕杀共产党人。九月九日，县委书记刘慈源被张天佐暗杀。为了在白色恐怖下坚持革命斗争，县委活动基地由昌乐中部转移到胶济铁路以北万庄村。十月，继任昌乐县委书记赵西林在万庄党员刘冠俊家召开县区党的负责人会议。刘智堂根据县委决定，在万庄村开设中药铺，以坐堂先生为掩护，开展昌乐北部党的工作，他发动党员集资购买油印机一部，秘密印刷革命宣传品散发。是年冬，刘智堂的地下活动被敌人察觉，张天佐派保安团到万庄捕杀刘智堂等共产党人，刘智堂等人机智脱险，万庄中药铺被

迫停办。为避开敌人的锋芒，刘智堂奉上级党的指示去地委党校学习，不久，又回到昌乐继续开展党的活动。

一九四〇年春天，张天佐疯狂地破坏昌乐党的组织，枪杀、活埋共产党员、革命群众五十余人。刘智堂被迫转移到昌乐东北部边沿的潍县望留区（今潍城区望留镇）坚持地下斗争。十月，鲁中区党委鉴于国民党对昌乐党员的残酷屠杀，为保存革命力量，调县委书记赵西林去鲁中区党校学习，昌乐县委的工作由刘智堂和刘焕奎负责。刘智堂在这种极端险恶的形势下，不妥协、不动摇，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定的立场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十一月八日，刘焕奎被国民党保安团杀害，形势进一步恶化，昌乐一时处于白色恐怖状态。根据鲁中区党委的指示，刘智堂与中共望留区委书记张立武取得联系，在望留街以开设中药铺为掩护，建立“中共昌乐望留联络站”，领导昌乐和潍县南

部地下党的工作。联络站建立后，为了有个地盘站住脚，刘智堂首先开展了对范启奭的统战工作。范启奭是一支国民党地方武装——潍县人民自卫总队的总队长，与张天佐有过很深的个人矛盾，刘智堂便利用他俩的矛盾，积极做范启奭的工作。刘智堂利用看病的方便机会，首先团结了与范启奭关系密切的几个伪保长，又在张立武的配合下，做争取张福灵的工作。张福灵是范启奭的副官，为人比较正直，性情豪放，爱打抱不平，在潍县二区很有名气，他与范启奭是拜把兄弟，关系甚密。此人很有头脑，是范的得力谋士。在刘智堂的积极争取下，张福灵答应为共产党出力。果然，在张福灵的劝说下，范启奭的思想有了一定变化，对共产党采取不反对，不支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默许态度。这样，就使联络站党的活动有了主动权。这期间，在以刘智堂为首的中共望留联络站的领导下，望留一带党的活动比较活跃，

对昌乐境内党员开展坚持地下斗争的教育；接送过往铁路的革命同志；为鲁中根据地购买紧缺物资，为党的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九四一年六月八日，刘智堂隐蔽望留开展地下工作被张天佐发现，张天佐便密告国民党山东省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厉文礼。厉文礼接到密告后，电令范启奭抓捕刘智堂。范启奭不敢怠慢，派部下“学兵连”将刘智堂抓获，关押在大圩河。当天晚上，张立武组织了四位与范启奭关系密切的伪保长前去保释刘智堂，均遭到严词拒绝。第二天，张立武又动员张福灵做范的工作，范启奭权衡利弊，决定不杀刘智堂，但也不能交给张天佐。第二天晚上，范启奭把刘智堂传到跟前说：“已经挖好了坑子，今天晚上就活埋你！”随后命令心腹张福灵带三四个士兵把刘智堂押到三四里路远的荒野。张福灵对刘智堂说：“掌柜的（指范启奭）放你走。”说着给刘智堂松绑，

将刘智堂放走。这天晚上实际上活埋了一个被抓获的土匪，以此来掩人耳目，搪塞上司，应付张天佐。

刘智堂脱险后，一时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便凑了些路费，装扮成商人去了沈阳。在沈阳，他以经商为生，仍不忘党的工作，经常化名写信，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一九四二年六月，刘智堂从沈阳回家乡寻找党组织，当火车路经淄河大桥减速时，他机智地跳下火车，去临朐一带找益临工委。当他走到益都（今青州）朱崖村时，不料被唐英云的汉奸队抓住。敌人怀疑他是八路密探，对他严刑拷打。刘智堂面对敌人的酷刑，咬紧牙关，一口咬定自己是医生，去博山看望下煤窖的儿子，路经此地，敌人不相信，又用子弹拨他的肋骨。刘智堂疼痛难忍，汗如雨下，但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敌人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处，把他扣押了一夜，勒索了他的医书、钢笔、眼镜等物，又臭骂了一

顿后才放行。刘智堂又经过几天的长途跋涉，历尽了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益临工委。工委组织部长赵西林热情接待了他。刘智堂找到党组织后，马上要求党分配他工作。工委经过研究，认为他不宜再回昌乐工作，决定安排他到边沿山区开展党的地下工作。

一九四六年三月，根据旧政协会议精神，奉上级指示，昌乐县政府在临朐大高庄召开各界人士代表大会，建立“三三”制民主政府，选举了昌乐县民主政府县长、参议长。他积极团结社会民主人士开展民主运动，揭露蒋介石企图抢占抗战胜利果实，建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独裁统治的阴谋。六月，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发动了全面内战，敌我斗争激烈，战斗频繁，党组织调刘智堂到沂山地委机关工作。

一九四八年昌潍地区解放后，昌潍地区在益都东门成立人民药社，直属地委领导。党组

织为照顾刘智堂同志的身体，安排他负责人民药社的工作。刘智堂服从组织分配，不计名利，认真负责，勤勤恳恳，始终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优秀本色。刘智堂投身革命后，舍生忘死，无私奉献，因操劳过度，积劳成疾。曾在益都、潍县治疗，因医治无效，于一九五九年病逝，终年七十一岁。

潺潺丹水颂英烈，巍巍方山立丰碑。刘智堂同志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所表现的大义凛然、刚正不屈的宽广胸怀和高风亮节，永远鼓舞着千万齐鲁儿女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奋斗。

抗日战争时期的万庄和圈子

肖文贞

抗日战争时期，昌乐县曾广泛地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国民党的圈子，共产党的万庄。”万庄和圈子地处孤山下铁路旁桂河转弯的地方，是昌乐县东北隅的两个大村，万庄居东，圈子在西，两村近在咫尺，却代表着革命和反革命两个营垒，针锋相对，进行着殊死的较量。

圈子村有个张墨仙，原名叫张砚田，事变之前，他是联庄会长，因受国民党昌乐县长王金岳的赏识，升任他为昌乐县二区区长。1938年3月，张天佐攫取军政大权，张墨仙被委任为张部第八连连长，仍兼二区区长，旋被擢升为昌乐县动员委员会主任，负责征收柴粮，统筹人力，组织青年工作队，筹设枪弹制造厂。

张墨仙手中握有军权、政权，在圈子庄掌有族权，八面威风，不可一世。他在昌乐东北乡网罗党羽，培植爪牙，作威作福，鱼肉乡民。万庄首当其冲，百姓倍受其压榨欺凌，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万庄村村大而穷，出了名的有“三多”：孤山石匠多，长工觅汉多，讨饭要吃的多，是远近有名的“叫花子村”。万庄穷苦百姓当中的青壮年，在生活无着的情况下，只有靠山吃山，越过村前的胶济铁路，爬上孤山打石头，当石匠。他们在常年的艰苦劳作中养成了吃苦耐劳、敢说敢当、好打不平、勇于反抗的优良品格。只是群龙无首，尚未觉醒，被圈子村张墨仙之流视为“万庄无人”、“乌合之众”，常常遭受欺侮，多年饱受煎熬。其实，万庄才是个真正藏龙卧虎的大邦之地。孤山石匠刘荣杰，性情刚烈，极讲义气，“七七”事变后为了抗日救国寻找出路，单枪匹马北去寿光牛头

镇，投奔抗日志士马保三，在昌乐东北乡传为佳话；他的胞弟刘荣华（参加革命后更名刘秀峰），原在县城师范讲习所求学，事变后失学在家，联络西水坡同学于民一，在铁路两侧农村奔走呼号，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和募捐活动，大得人心；万庄村小学教员刘继堂，原名刘道利，此人身材矮小，走路好迈大步，常戴一付眼镜，人称“小先生”，他头脑机敏，能言善辩，以其雄辩的口才，为穷苦乡邻把输掉的官司重新打赢，讨回了公道，因而极受村人爱戴。此外，刘继堂的叔父刘冠俊，孤山石匠刘重印、刘宗禹，青年小伙子刘树义、刘好德、刘保德，都是血气方刚的热血男儿。在张墨仙之流的蹂躏、重压之下的万庄，宛如一座正待爆发的火山。自从中共地下党在昌乐的势力发展起来，万庄百姓才真正挺起了腰杆。

第一个到万庄开辟党的工作的，是来自方山前下庄村一位中医先生。时间是1937年秋

天。万庄百姓因为生活穷苦，平日有病熬着，有痛忍着，听说村里来了中医先生，都争相前来求医问病，日久天长人们发现，这个慈眉善目的老中医，不仅会看实病，还善于看“心病”，从他嘴里，人们知道穷人为啥会多病，为啥会受穷，什么叫“贫病交加”，他告诉人们，穷苦百姓只有抱成团，形成一个铁拳头，跟张墨仙那样的人作斗争，才会有出头之日，才能过上好日子。人们很快便看到，刘荣杰、刘荣华、刘继堂、刘冠俊、刘重印、刘宗禹等有本事的人，都在这个老中医身边抱成了团。这年初冬，老中医又从孤山南边小解召村联络了一位白了头发的教书先生，介绍他在刘荣杰的家里一住就是半月。后来人们才知道，教书先生名叫刘慈源，又名刘恺，中医先生名叫刘锡永，又名刘智堂，都是共产党员。这年冬至来年的春天，他们二人互相配合，首批发展刘荣杰、刘继堂、刘重印，刘宗禹四人入党，

并于1938年6月成立了由刘荣杰任书记的中共万庄支部。

万庄出了共产党，圈子张墨仙如临大敌，闻风而动，他指使其爪牙闯入万庄，挑起宗族纠纷，激化矛盾，挑拨成讼，诱骗“二堂”

（刘智堂、刘继堂）抛头露面，代打官司，使其陷入矛盾漩涡，扩大自己的对立面。他妄想使矛盾双方之一的万庄人帮伙起来挤走这个名叫刘智堂的“外路户”。刘智堂识破张墨仙的阴谋，组织党员同志在群众中揭露敌人的诡计，通过艰苦细致的工作消除误会，化解矛盾，团结一致，共同对付圈子庄的国民党势力。张墨仙的阴谋未能得逞。

1939年1月，张天佐制发《异党及不良分子调查表》，责令各乡镇保长秘密查报，为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作准备。张天佐在他的县府驻地鄜鄜镇郑家庄，亲自授命其要员张墨仙密查万庄共产党员的行踪，伺机捕杀，圈子

国民党的势力更加嚣张起来。在极其险恶的形势下，万庄党的活动进入隐蔽状态，但党组织的规模却在迅速扩大。到1939年4月份，又有刘冠俊、刘好德、刘保德、刘树义、刘龙吉等14人入党。万庄成为张墨仙切齿痛恨的“八路窝子”。

1940年春天，张天佐在推行保甲制的基础上，实施五家互保连坐法，利用枪杀、活埋、“砸核桃”等残忍手段残酷杀害共产党人。张墨仙亲自到万庄办理五家互保连坐切结，妄想取缔共产党在万庄的一切活动。为了对圈子国民党势力进行有效的斗争，中共万庄支部派出党员刘宗禹打入敌张墨仙部，进行分化瓦解敌军的工作，见机行事，策应党的活动。一天，刘宗禹侦知张墨仙手下兵丁在邻村戴家村外一次挖好两个窝子，要活埋万庄共产党员刘继堂和已任中共昌乐四区区委书记的刘智堂。刘智堂指挥万庄共产党员帮助刘继堂同志脱险，转

移到鲁中抗日根据地，然后指派刘宗禹虚张声势，带领张墨仙兵丁去刘继堂家中抓人，自己也趁机转移，致使敌人捕杀计划落空。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给上级输送人才，中共万庄支部先后四次组织万庄党员同志到抗日根据地参军参战：第一次，党组织保送刘秀峰去抗日根据地，入中共山东分局岸堤军政干校深造；第二次，中共万庄支部派出专人护送刘保德、刘好德赴八路军山东纵队一支队情报训练班学习；第三次，中共万庄支部组织党员掩护刘继堂同志脱险，介绍他去鲁中区二地委党校学习。紧随其后去抗日根据地的有刘智堂、刘冠俊、刘安庆、刘国庆、刘大乾、刘道成、刘湘环、刘龙吉、刘维吉等十多名共产党员；第四次，1940年4月23日，圈子国民党暗杀团分子诱杀刘荣杰同志，刘荣杰巧施调虎离山之计，摆脱敌人，逃离虎口，带领刘重印、刘宗禹、刘树义3名共产党员同赴鲁中抗日根据

地。

万庄共产党员分四批奔赴抗日根据地参军参政，总数达17人之多。他们在革命大熔炉里健康成长，有不少人担任了我党我军的重要领导职务。党员同志离开了万庄，但“共产党的万庄”这句话已经叫响，传遍了昌乐全县以及整个鲁中地区，万庄永远是共产党的天下。

“共产党的万庄”，这句话极为贴切，传神，而“国民党的圈子”之说却大有问题，抗日战争时期曾任中共奉天特委书记的张适（原名张来顺，化名张有才）同志，是名震东北三省，闻名全中国的共产党员，他的祖籍就是昌乐县的圈子庄。革命战争年代，圈子庄人民对国家也做出了不少贡献。

巩固新政权的斗争

韩文圣

1948年5月1日，在渤海三军分区和渤海炮团的围攻炮击下，张景月率部趁雨夜组织突围，我军乘胜追击，挺进城里，控制了整个昌乐县城。这座被日伪顽统治奴役达十年之久的县城，终于被我军解放，回到了人民手中。同日，困守仓上之敌弃点而逃，昌乐全境解放。昌乐人民从此获得了新生。

昌乐解放后，面临着严峻的困难和问题。由于昌乐是国民党的“模范县”，昌乐人民长期处于张天佐政治上的高压和恐怖统治，经济上的残酷掠夺，文化上的欺骗蒙蔽，再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和战争，全县人民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生活上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和问题。

因此，全县百废待兴。而张天佐的残渣余孽并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分散在全县各地的土匪、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反动道会门头子和其他坏分子，乘县政权刚建立未稳之机，利用各种手段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妄图搞垮新生的人民政权。在此情况下，县委带领全县人民开展了巩固新政权的斗争。一方面大力开展剿匪反霸、反奸诉苦、减租减息等群众运动，稳定社会局势；一方面大力发展生产，恢复国民经济，支援全国解放战争。

昌乐解放后，县独立营营长杨玉璇、县委副书记何子健、县民运部长兰陵率县独立营的两个连和准备接管昌乐工作的几十名干部进驻昌乐县城。县委书记、县独立营政委赵西林率独立营的一个连和部分干部进驻张天佐的老巢马宋镇仓上村。进驻县城和仓上后，县委和独立营一方面向广大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一方面组织领导全县人民，肃清散匪和武装特务，

稳定社会秩序。在县城，我党政干部和独立营指战员发动和带领群众，拆除敌军修筑的碉堡等建筑物，恢复县城内外各种设施，店铺很快开门营业，五图煤矿恢复生产。在农村，县委抓紧建立区乡人民政权，组织人民群众开展反霸、反敌、反特斗争，扫除张天佐的残余势力。

为保证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县委、县政府首先健全了内设组织机构。县委领导成员6人，书记赵西林，副书记何子健，组织部长芦英华，宣传部长杨成栋，民运部长兰陵，妇女会长赵建平。县政府由赵西林兼任县长，刘圣清任副县长，下设秘书处，民政、财政、实业、司法、文教五科，公安、粮食、邮电、工商四局，以及银行办事处、推进社等机构。为了充实昌乐县各级党政机关，中共鲁中三地委调集大批干部来昌乐，支援新区政权建设。在地委的大力支持和县委的领导下，城关、朱刘、五图、南郝、北岩、乔官、马宋、朱汉、鄆郜、

金山、清泉 11 个区委和区政府相继建立，并迅速开始工作。为保障各区工作的顺利开展，县委决定加强各区武装力量，从县独立营抽调部分干部战士，充实到各区，协助区委和区政府开展各项工作，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进行扩军、基层武装建设等工作。

为彻底摧垮张天佐的反动统治，昌乐县政府明令取消了张天佐的保甲组织，通过有组织的人民选举和政府批准，建立临时村政权。村政权的任务是，执行上级指示和命令，清剿散匪，报缴敌伪枪支物资，办理敌伪人员登记和联保具结，管制坏分子，维护生产生活秩序，支援前方战争。至 1948 年 7 月，全县 744 个村庄中，有 512 个建立了村政权，在全县范围内彻底摧毁了国民党的反动政权，建立了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民主政权。人民政权的建立，对于宣传贯彻党的政策，清剿散匪，恢复生产，安定社会秩序，都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其间，由于敌残余势力活动猖狂，杀人抢劫案件时有发生。以张京尧、贾德富、刘德宽、傅道武、刘忠堂、宋连生、秦志仁、赵世荣为首的八股反动势力，到处抢劫，造谣惑众，严重危害社会秩序。为此，在建设政权的同时，县委配合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清剿，开展了政治攻势，广泛宣传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方针政策 and 法律法令，加强社会治安，维护社会秩序。在人民群众的有力配合下，全县共破获案件400余起，惩治武装特务11人，匪特92人，土匪29人，策动逃敌者76人，破坏交通犯21人，反动道会门头子6人，杀人犯76人，假造印章者14人，共处理589人，其中镇压7人，判刑59人。打击了张天佐残余势力的嚣张气焰，维护了昌乐县的社会治安。

为进一步搞好剿匪和反霸斗争，根据华东局和鲁中三地委指示精神，1948年6月26日，县委、县政府在乔官街召开公判大会，公审和

枪决了 1940 年杀害我区委书记于临凤和地下联络员于新文的凶手、恶霸地主吕经邦和杀人犯、恶霸地主高曰清等人，教育和鼓舞了人民群众，震慑了敌特分子，推动了全县反霸、反敌、反特斗争的开展。同时，以县独立营和各区中队为主，公安机关配合，通过发动群众，集中开展了清剿散匪、收缴武器、反动党团和伪顽人员登记审查工作，共收缴大小炮 4 门，各类枪支 2446 支，子弹 35000 余发。登记审查国民党区党部 20 个，区分部 219 个，国民党党员 3400 多名；三青团区队 22 个，三青团员 4000 余名。经过登记审查，反动党团和伪顽人员中，绝大多数都表示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在此基础上，继续深入地进行政治思想教育，除少数坚持反动立场者外，绝大部分得到了改造，其中有些人后来参加了革命工作，为人民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1948 年 7 月，经中共中央华东局批准，中

共昌潍地委、昌潍行政公署在昌乐成立，地委书记赵毓华，专员赵笃生。地委辖昌乐、寿南、新安丘三县。地委会驻昌乐城。昌乐县委、县政府机构移驻乔官镇梁家庄。此后，在昌潍地委、行署的领导下（原属中共鲁中三地委领导），昌乐县委、县政府多次召开会议，总结村政权建设、研究布置减租减息和夏征秋种等工作，鼓励农民搞好生产。并于1948年11月底召开了县区党政群干部、人武部干部和独立团排以上干部（此时独立营已升级主力团）等300余人参加的联席会议，总结全县区、乡、村政权建设、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和扩军支前等工作，部署土地改革、冬季生产、整党建党和参军支前等各项工作，要求全县党政军民要以实际行动搞好各项工作，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在县委的领导下，全县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很快医治了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巩固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政权。

从昌乐解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这短短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内，县委根据新区的形势和特点，除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迅速摧毁了敌人的区乡村三级政权，建立了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民主政权；在独立营的协助下，迅速建立了各区人民武装，完成了剿匪任务；对反动党团和伪顽人员，进行了登记审查和处理工作外，还围绕新政权的巩固与建设，开展了如下工作：

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增加工资、反奸诉苦运动，广大劳动人民从政治上、经济上得到翻身。根据华东局新区工作会议精神，县委决定当时不急于进行土改，先搞减租、减息、反奸诉苦斗争。通过“双减”，贯彻党的阶级路线，发动群众，提高人民群众的阶级觉悟，彻底改造基层政权；发展生产，恢复经济；成立工、农、青、妇等群众组织；发展党员，建立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双减”的主要内容

是“减租、减息、废除债务，改善雇工待遇，处理被霸占、被掠夺的土地”，使广大农民从经济上、政治上得到翻身，然后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土地改革。“双减”斗争在昌潍地委和县委的领导下，以南郝、乔官两区为重点，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由点到面逐步展开。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内，顺利完成了“双减”任务。运动发展是健康的，封建统治被摧垮，人民觉悟有了极大的提高，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基层政权更加健全和巩固，工、农、青、妇和民兵组织相继建立起来，积极分子成批地涌现出来。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一批新的党员，建立了农村党的组织。使昌乐党的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出现了一个新局面。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改善劳动条件。昌乐全境解放后，县委根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精神，迅

速在全县掀起了以发展生产、恢复经济为中心的各项建设工作。独立营进城后，通过张贴布告，宣传党的政策，清理战场，召开群众会议，很快安定了民心，工商业者开门营业，受蒙蔽外流的群众纷纷返回，广大人民群众心花怒放，欢欣鼓舞，昌乐由黑暗走向了光明。在经济建设中，县委领导群众开展生产救灾，积极扶植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的发展，鼓励农民搞好生产。县委还多次召开会议，研究布置夏征秋种，要求区乡村搞好农贷发放、帮工换工、积肥选种等工作。全县共发放肥料贷款 3500 多万元，贷种 43600 斤。同时，根据 3000 绝粮户的严重情况，动员一切社会力量，贯彻生产救灾、社会互济和政府协助的方针，号召群众发扬阶级友爱精神，亲帮亲，邻帮邻，非灾区帮助重灾区，富有者帮助灾民。在县委的领导下，全县人民团结互助，很快渡过了难关，尽快恢复了农业生产。1949 年春，县委召开全县

生产积极分子会议，总结表彰恢复发展生产中涌现出的先进单位和个人，部署春耕生产。全县党政军民热烈响应毛主席“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的号召，迅速掀起了春季生产高潮，以实际行动支援解放军南下。

比较快地恢复发展了文化教育事业，培养、教育、改造了知识分子，迅速占领了城乡文化教育阵地。由于受国民党长期的欺骗宣传和奴化教育的影响，在刚刚解放后，部分知识分子中存在着严重的思想混乱现象，不少人犹豫不定，顾虑重重。为此，县委有计划地举办了两期规模较大的教师训练班，并多次召开师生座谈会。通过深入广泛的宣传教育，教师、学生思想有了明显的转变，初步树立了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教学的思想。这对刚解放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变化。在解放后很短的时间内，全县中小学都已开学上课。每个区都有一处高小，全县小学 260 处，中学一处，教师

达 370 多人。入学人数不断增加，儿童入学率达百分之三十六，这在当时来说，入学率是比较高的。凡有学校的村镇，都设有夜校和识字班，这对扫除文盲，提高人民文化水平，破除封建迷信思想，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树立共产主义思想，移风易俗，发扬新的道德风尚，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巩固新生人民政权，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同时，大力支援全国解放战争。为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县委在全县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了动参支前工作。在动参工作中，各区遵照县委指示精神，采用家庭访问、文娱活动、召开座谈会和村民大会等形式，深入发动和进行拥军优属的思想教育，形成参军无尚光荣，军属人人尊敬的社会风气。在拥军劳军活动的基础上，开展扩军宣传，推动了动参支前工作的顺利开展。1948 年 7 月，奉上级指示，县委将昌乐县独立营扩编为昌乐县独立团，辖三个营

1200余人。县独立团团团长王兆祥，副团长陈洪，政委由县委书记赵西林同志兼任，参谋长杨玉璇，政治部主任王光廷。独立团成立以后，积极配合县区开展各项工作，并在县城集中进行了整训，提高了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和战斗素质。1948年11月，为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昌乐县政府又派出担架105付，组织民工541人，编为一个大队五个中队，在大队长刘启玉、教导员郑冠五的带领下，随大军南下参加了淮海战役。县妇女会发动全县妇女做军鞋6100双。1949年1月，为了“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最后一战，昌乐县独立团奉调，被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八兵团警卫团，随大军南下参加渡江战役，昌乐人民为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做出了应有的贡献。1949年3月1日，遵照华东局关于组织干部南下、接管新解放区的命令，昌乐县委在干部缺乏的情况下，从全县抽调75名党政

干部骨干，组成一套县级和八套区级班子，随军南下，接管新的解放区，为支援全国新区政权建设贡献了力量。

上述工作的全面开展，不仅巩固了昌乐新生的革命政权，改变了昌乐的局势，而且为建国后的土地改革、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加强党的建设，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49年7月13日，昌潍地委和行署机关移驻青州，昌乐县委、县政府由梁家庄迁回昌乐城。县委组织领导全县人民，认真学习上级文件，贯彻上级会议精神，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同全国人民一道，迎接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

总之，从昌乐解放到建国前，是昌乐人民彻底翻身解放的年代，是昌乐翻天覆地大变革的年代，是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年代。这在昌乐革命史上，是极为不平凡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年代。

昌乐县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赵光海

1948年昌乐解放以后，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土地改革运动，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了农民土地所有制。土改以后，个体农民有两重性。一方面，他们是劳动者，有组织起来集体生产的积极性，他们在生产过程中，由于缺少兴修水利、抗御自然灾害和采用推广先进技术以及农业机械化的能力，确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和愿望；另一方面，他们又是私有者，小农经济极不稳定，每日每时向两极分化，如有的说：“分了田分了地，斗了地主出了气，安安稳稳过日子，个人发财各人的。”事实上，已经出现了买卖土地、出租、典当、放高利贷、雇工等新的剥削形式。据东山乡调查，贫农户

数由 256 户下降到 147 户，中农由 241 户上升到 453 户。原来没有富裕中农却达到了 100 户，富农由 20 户增加到 43 户，卖地者 27 户，卖出土地 589 亩。还有个别户进行雇工、放高利贷、常年雇短工的 54 户。以上情况表明，在农村中，有的贫农上升到中农，中农上升到富裕中农，甚至上升到新富农；有的因天灾人祸，倾家荡产，重新走向贫困。同时，城镇资本主义工商业，追逐利润，争夺市场，破坏国家经济政策，投机倒把的“五毒”行为也相当严重，与国家经济计划相对抗。所以，土改以后，党领导农民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的道路是完全必要的。积极而又稳妥地经过具体的、恰当的过渡形式，把农民个体生产的积极性，引导到合作化的轨道上来，从而克服那些建立在个体经济之上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也是完全可能的。

为了把翻身农民引向互助合作集体化的道

路，从1949年开始，县委一方面领导农村大搞生产运动，做好经济恢复工作；另一方面着手在小农经济中有步骤的培植社会主义经济成份，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化的道路。1949年冬，在东山乡东村建立第一个互助组——王诵书互助组，有12户，第二年又扩大了2户，这是全县最早的互助组。次年，在试点的基础上，互助组普遍建立起来。其形式分3种类型，第一类是临时性耨耨组织形式的互助组，特点是临时季节性的，一般每组3——5户，自愿结合，在主要农作上换工互助。第二类是常年变工互助组，主要农作常年变工互助，逐步做到劳力、农具、畜力合理使用。第三类是常年互助组，主要特点是充分发挥每个劳动力的作用，按劳力、技术、资金等不同条件，规定分配办法，这是一种带有萌芽性质的社会主义集体组织形式。到1954年底，全县普遍建立常年互助组6290个，参加农户51936户。县委在普

遍建立互助组的基础上，开始试办初级社，1952年底至1953年春，在二区东山乡东村李逢源互助组基础上，另吸收了王帮昌、于林富两组的8户，试办初级社一处，共21户，土地258亩，全部入股，统一经营，按股分红。这是一种以土地入股为特点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集体组织形式。

1953年9月，党中央公布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就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昌乐县从城镇到农村，所有的工人、农民、干部、群众、工商界无不欢欣鼓舞，敲锣打鼓、奔走相告。为把总路线宣传贯彻好，县委于12月12日召开了有1327人参加的县、区、乡三级干部会议，各区也相继召开乡、村干部扩大会议，全县调集万名宣传队员，利用各种形式，宣传贯彻总路线。通过宣传发动，

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思想深入人心，为全县实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思想基础。

县委在宣传贯彻总路线的过程中，认真掌握以总路线为动力，推动农业生产、统购统销工作，特别是互助合作的开展。六区辛旺村，在总路线教育的一个晚上就组织了11个互助组，四区龙旺村在办了6个互助组基础上纷纷要求成立初级社。一个月时间，全县就有66个村，95个互助组，919户要求成立初级社。至1954年春，全县14个区1个镇，达到了区区有社，发展到677处，参加农户13838户，其中贫农9359户，中农4477户，地主2户。

在办社过程中，县委加强领导，书记动手，全党办社，认真执行中央提出的积极稳妥的方针，既反对不从实际出发，不顾客观条件，盲目发展的倾向，又反对缩手缩脚，踏步不前的右倾保守思想。县委成立了以陈树萱为组长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举办互助合作培训班，

三批培训骨干 182 人，从而保证了办社质量。

初级社的分配问题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它涉及到每个社员的切身利益，直接关系到入社社员的积极性和社的巩固与发展。对劳力和土地报酬比例实行了三种办法，即“地四劳六”、“地五劳五”、“地三劳七”。昌乐县一般实行“地四劳六”的分配形式，草随粮分。牲口使用采取两种办法，一种是折价入股，按市价 3—5 年还清，一种是作价私养。大型农具的使用与管理，一般是归私有，公修补贴，也有折价入社的。小型农具都是社员自带自用自修。在收入分配上一般一年两次分配，麦季予分，年终决分。初级社是一种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集体化组织形式。

1955 年 1 月，党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合作社的通知》指出：农业合作社应转入控制发展着重巩固阶段，要根据各地不同情况，分别采取不同措施。县委根据中央指示

精神，对发展过快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做了必要的调整，收缩了31处合作社，465户。

1955年7月，党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关于农业合作化会议，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总结了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史经验，阐述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步骤和意义，注重了自愿互利，逐步推广的原则，并强调注意合作社的质量，注意整社等。但报告对右倾批评是不合实际的。夏季以后，发生了对农村工作部长邓子恢的错误批判，比喻他是“小脚女人”，指责他右倾。从此急躁冒进代替了逐步过渡的思想，加速了农业合作化的进程。昌乐县于1956年元月18日举行空前规模的3万人大会，敲锣打鼓、游行庆祝，欢呼三大改造的胜利，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全县入社农户由13322户迅速增加到64313户，小社迅速合并，初级社纷纷升为高级社，有的由互助组一下子

跃到高级社，基本上实现了全县农业合作化，提前两年完成了县委提出的 1955 年至 1957 年实现全县农业合作化的要求，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此，在农村消灭了延续几千年来的私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形态占了统治地位，社会主义制度在农村初步确立。

全县实现高级社以后，根据社的大小，建立管理委员会，负责生产领导和具体经营管理。社以下设生产队，具体实行生产操作，采取评工记分的方法。工分是进行分配的依据，对无劳力和鳏寡孤独实行三定（定实需工日、实干工日、补贴工日）五保（保吃、保穿、保烧、保教、保葬）；对烈军属，本着高于一般社员收入水平的原则，补助实工分参加分配；职工家属等于一般社员收入水平，补助虚工分，只参加口粮分配；对生产队干部实行两定（定实干工日、定补贴工分），统一参加分配。

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县委始终贯彻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的阶级路线，入社农户上保持贫下中农的优势。在大批农社巩固下来的条件下，对地主、富农进行规划入社，根据省、地委指示，有计划地吸收他们入社，一般根据他们的表现，劳动态度，经民主评议、领导批准的方法吸收入社。对不够社员条件的，先作为候补社员，待确实表现好了以后，再转为正式社员。

昌乐县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同全国一样，是一件伟大而有意义的事业。在党的领导下，仅用了4年时间就实现了这一变革，建立起农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并且没有使生产受到损失，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从此，土地归集体所有，铲除了几千年来农村剥削的基础；农村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天地。

党在领导农业合作化的工作中也出现过一

些偏差，这主要是1955年夏季以后，从中央到地方滋长了“左”的急躁冒进情绪，对合作化的速度要求过急，初级社站脚未稳，马上并社升级，不少农户超越了初级社这一关键步骤，一下子跨入高级社；工作过粗，不少新建的高级社，只是挂个牌子，搭个架子，社内劳动组织、生产责任制、分配制度、财物和物资管理制度也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不应采取一个模式，一种速度，一起向前平推，实行“一刀切”。在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样大的社会变革运动中，出现一点偏差，存在某些缺点，是在所难免的。实践证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的理论和政策是正确的，我们党领导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顺利的、成功的。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把个体经济改造成为集体经济的成就是巨大的，意义是深远的。

初春的步履

——记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李逢源

王庆荣

1948年5月，万里春雷震苏冰冻尘封的昌乐，阴霾散尽，劳苦大众拨云见日，一片欢腾。经过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运动，在封建桎梏下挣扎的农民得到了赖以生存并属于自己的土地，“耕者有其田”的幻想变为现实。历史上无数次农民革命梦寐以求而又终归失败的悲剧和教训，使饱受封建制度压迫的农民尝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甜头。他们打起锣鼓，扭起秧歌，欢庆庶民的胜利。

他们还没来得及想，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工具能把这种特殊历史条件形成的欢欣鼓舞

的局面维持多久？谁能保证几年以后没有人重新失去土地？陈旧的生产方式究竟能多大幅度提高新中国建国伊始所急需的生产力？面临这些复杂而又实际的问题，党和政府适时地为获得解放得到土地的农民指出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唯一的出路，携起手来，走共同快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合作化道路。

党的这一符合中国农村实际状况的英明决策，在昌乐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绽开的第一朵花结出的第一个果便是在实践中不断巩固发展的第二区东山乡东村初级农业合作社。变革前进的时势也造就了佃户出身的农民省级劳动模范李逢源这一闪光的农民形象。

鉴于历史原因，东村初级农业合作社主任李逢源和部分入社骨干户都是郭家庄农民。因土地改革划分成份时各自然村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均有一定比数，而郭家庄生活富足占有土地多的户数较多，为了统筹安排，所以将

原属东村等处的一部分贫困户并入郭家庄协调组织，因此初级社以“东村初级农业合作社”命名。

东村与郭家庄两村都地处县城南隅一公里，现已融入城区。这里土地肥沃交通方便。从地理位置而言，具备发展农业生产的先决条件。但在生产资料匮乏的条件下，一家一户独立耕作经营的方式限制了生产的发展。一些人单力薄、缺少生产资料和畜力及农具的家庭，面对土改后到手的土地仍是力不从心，愁眉难展。

1949年，昌乐县人民政府在丹河区东山乡东村试点，组织起全县第一个互助组——王诵书互助组。该组12户农民同心协力，当年便获得空前的丰收。当时任农会会长的郭家庄村村民李逢源受到很大启发，在政府的指导下，他于次年便响应政府号召，组建了由8户人家组成的李逢源互助组。

互助组各户均属贫、下中农，设组长一人，记工员一人。组内人家自愿出工，也可以畜代工，出工多少均无报酬，纯属互帮互助。各户土地收入全部归自己所有。李逢源互助组还对组内军属实行了代耕措施。所谓代耕，其实是代耕、代种、代管、代收获的一整套服务。收成完毕，直到粮食送到军属家中入囤而不取任何报酬。用李逢源的话说就是“凉水也不喝人家一口”。代耕措施对解除从军人员后顾之忧，稳定前线军队思想情绪起了很好的作用。李逢源在组内事事当先，宁可撂下自己家的庄稼不顾也先去帮军属和劳力少的户下地干活，受到群众的赞扬和信赖，为党和政府各项政策的落实和以后成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是年，李逢源被选为昌乐县人民代表，并出席了县人民代表会议。这年2月，他不顾家中劳力缺乏和战争残酷，毅然送次子李良才参

军。同年6月，李良才牺牲于益都县弥河岸边，成为光荣的革命烈士。失子的悲哀，没有影响李逢源办组办社的热情和决心。他从不在人面前伤心难过或以烈士家属自居，一心一意沿着党和政府指出的路踏踏实实走下去。

由于李逢源互助组及其本人事迹的影响，1952年10月，县人民政府派合作部部长神庆泉和尹安贞、李平之三位同志到郭家庄，与李逢源等共商成立我县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解放初期的城郊农村之夜，没有灯火，没有嘈音，静得悠闲而沉闷。但李逢源家中那盏如豆的灯炬下，人们却在运筹着前所未有的变革。多少个夜晚，晓鸡啼鸣他们才揉着熬红的眼睛却毫无懈怠之色地散去。白天，田里的李逢源干起活来照样虎虎生风。他以对党和政府的信赖与忠诚去感召着周围的一切。10月底，李逢源互助组与东村王帮昌、于林富互助组联

袂办起了全县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二区东山乡东村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经民主选举，李逢源任社主任，杨润任会计。全社耕地 206 亩，16 户，81 人，劳力 24 人，家畜仅有 6 头。

初级合作社采取入社自由，退社自愿的原则，对入社只做动员发动，不强制推行。在建社酝酿发动阶段，部分农民鉴于土地私有制的传统影响和对土地的依恋情绪，认为入社是把已经到手的属于自己的土地拱手交出，且对史无前例的合作社的前途表示担忧，所以态度比较消极。有的甚至说：共产党这是咋啦？分给咱的地又要要回去？李逢源在政府干部的指导配合下，走街串巷出门入户，搓着两手泥巴做了大量宣传发动工作，在坚持自愿的前提下，终于动员大部分互助组成员同意入社，第一个初级社才得以顺利诞生。

初级合作社一改几千年来个体小农经济的

旧生产方式，首次推行集体生产模式，统一安排各项农事和劳力、工具、畜力等的使用，增强了优势互补能力，大大提高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并触及了人们的意识形态领域，使沉闷千年的小农生产方式发生了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变化，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

初级合作社的产出分配，实行定租制。按入社土地、农具、肥料等投入数量和劳动出勤的多少综合分红。土地产量的30%作为地租按土地数量、质量分配，年终大略按“土四劳六”比例结算分红。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在初级社中已有较大程度的体现。初级社虽非完全集体所有制、但已具有相当成分的社会主义性质，它为以后高级社完全集体所有制的推行奠定了基础。

佃户出身而被历史地推上主宰位置的社主任李逢源，面对社会地位和人生价值的飞跃，惟一的想法就是不计私利埋头苦干，当社里的

老黄牛。他除参加会议外，整天泡在田间地头，哪里农活重，哪里便有他的身影。播种高粱谷子的时候，别人都是一人牵头一人扶耩一人拉石砣子，仨人一组。李逢源则只用一人牵头，自己扶耩播种，肩上还拉着石砣，一人干两个人的活。但在记工时却只按一人计算。他以中国农民勤劳朴实的传统美德，为每一个社员做出了没有半点虚光幻影的实实在在的榜样。

他还同社员们细心研究，根据这儿土地肥沃等水土条件，打破“稀谷大穗”的传统种植观念，推行合理密植，加强田间管理和防治病虫害等一系列科学措施，1953年粮食亩产229.1斤，获得当时当地前所未有的农业大丰收。

他还同社员们一起再三推敲制定合作社章程，因人而异合理排工，务求人尽其力，挖掘发挥每个社员在生产劳动中的最大潜能。并采用“按件包干、按劳评工、死分活记”的记工评分办法，使报酬和出工紧密相联，进一步体

现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调动了社员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积极性。从此时起，表示农民劳动价值的“工分”应运而生，在以后近三十年的岁月中成为中国农民特有的在国家法定货币以外的有价证券或数字。

东村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建立和巩固，是我县向农业生产合作化迈出的第一步。它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面鲜艳的旗帜，它是一根“飞上天的鸡毛”。李逢源，这位合作化运动中的农民代表，为轰轰烈烈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1954年，李逢源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出席了山东省劳模会议。此后连续两年被评为省级劳动模范。1957年，光荣出席全国农业劳动模范代表会议。

在这片土地上的那一历史阶段，李逢源是解放后翻身农民的代表，是党的政策方针的忠实拥护执行者，是推动那段历史前进动力的一

份子。带着这种意念，笔者采访了现已74岁的李良存先生（李逢源之长子），对已谢世多年的李逢源同志的生平做了粗略的了解。

李逢源1901年出生于原籍昌乐县乔官镇韩家阳阜村一农民家庭。因家境贫寒没钱读书。为生活所迫，十几岁便去潍县一银铺学艺，学做银器首饰，俗称银匠。因不堪学徒生涯的繁重劳动和东家的奴役虐待和凌辱，16岁时他就离潍来昌乐郭家庄随父亲做长工。当时其父李玉进已在郭家庄做长工多年，但家庭仍在原籍韩家阳阜。后东家见李逢源朴实勤快、农活样样出色，就借三间碾棚给他，留他长住。以后他就在这三间敞棚中婚娶成家，并长期定居下来，但身份仍是长工。为了一家生计，他在做工的同时，还租种了少量土地，收成一半交地租，一半归自己，勉强维持一家数口艰辛度日。白天要给东家干活，租种的土地完全靠夜间劳作。说到当年的艰辛，须发皆白的李良

存先生不禁潸然泪下，说：“那些年，父亲没睡过一夜囫圇觉！”

说到办组办社那段时光，李良存先生说：“那时父亲也没白没黑地干，可他心里高兴干着有劲，如今想起来就没什么难过的了。”

成立人民公社以后，自1958年起，李逢源先后任东村大队大队长，郭家庄大队党支部书记。1965年，因年事已高且身体欠佳，才辞去职务。可他仍闲不住，带领村林业队员垦荒植树，绿化荒山野坡，为孤山林场的创建做出了贡献。

1982年，李逢源以81岁高龄谢世。他的一生，是勤奋的一生，劳动的一生，是值得人们追忆的一生。

刘 建 事 略

刘 炳 圣

五十年代主持《大众日报》社工作的刘建同志，笔者并不曾相识。编写志书却使我有幸于1992年以来，数次专访了报社与其长期共事的老同志，查阅了诸多可信的文字资料，使我从朦胧中逐渐了解这位前辈，心底和脑海油然而形成了刘建印象：热忱平易的为人，严谨治业的态度，实事求是的作风，感人至深。

刘建，原名刘善新，1917年生于安丘县泊庄村（解放后划归昌乐县）的一家书香门第。少年时期，在益都、济南等地的学习生活，使他目睹了国家内乱外患的现实，在学潮中接受了革命思想。1935年不满18岁就参加了省城学生运动，曾为绥远抗敌后援会募捐。1937年

7月，母校山东省立一中的学生运动受到反动当局的镇压。刘建潜回故乡，继续与同学保持联系，开展革命活动。1938年10月他在同学、中共地下党员于桂堂的引导下参加了八路军，在山东纵队八支队第四独立团任团部秘书。翌年3月在沂水杜家庄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把自己的毕生献给了人民解放的伟大事业。在入党志愿书上他把自已的名字改成刘建，以期在今后的革命生涯中，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有所贡献。不久，刘建受中共淄博特委书记魏思文的派遣，与张永杰同志一起，打入当时国民党控制的鲁东游击队第十团八连，从事秘密工作。他们在八连建立中共地下支部，向官兵进行思想教育，策动他们走抗日救国的道路，呼号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团结一心共同抗日。刘建文雅和气的风度，深受官兵尊重，他经常和官兵谈心，以深入浅出的道理，打动了战友的心灵，使他们自愿弃暗投明，抗日救国，发展了抗日

的力量。1939年秋，组织调刘建到中共山东一区二地委宣传部工作，长期从事党的宣传工作，历任干事、科长、宣传部长。1946年深秋，为粉碎蒋介石对山东的重点进攻，宣传胜利，鼓舞军民，中共沂山地委（鲁中区党委三地委）在沂源建立《鲁中大众》报社，年仅29岁的宣传部长刘建，受命于急需，负责报社的组建工作。在当时艰苦的战争环境里办报，没有现成设备，缺乏资金，更少专业技术人才，真是困难重重。刘建硬是带着几位科长、干事和印刷工人，运来旧机器，七拼八凑上设备，在山沟土屋里办起了报社，印出了表达人民心声，鼓舞军民斗志的第一张报纸。虽然时已秋风萧瑟，凉气袭人，尽管刘建和战友们还穿着单军装，却谈笑风声，干得热火朝天。当时新华社鲁中分社记者（建国后任青岛市政府秘书长）李黎明驻宣传部。一谈起鲁中办报，就翘起大拇指夸刘部长，为刘建拼命创业的精神叫好。

几十年过去了，这位离休老干部对笔者说：

“当时我看刘建的文弱书生气，真不相信他有劲头能办出报来，可他们拼了十几天后，竟把报纸送到了我的案头！”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合并后的中共鲁中南区委于1949年3月办起《鲁中南报》，刘建调任副社长兼副总编辑。长期繁忙的报社工作，使刘建养成了锲而不舍刻苦创业的作风，半夜以前从来不睡，挑灯夜战，不知疲倦。平时再忙再累，一得空就放声高唱，是京腔小段、肘股戏、解放区歌曲的杂家；或和战友们打打球，跑如流星，跳若虎跃。此时此刻，人们很难分辨出这位30出头的汉子，竟是山东解放区报的主要领导者。新中国成立不久，1950年5月，刘建告别了沂蒙老区，从临沂城来到了省城济南，肩负了中共山东省委交给的创办《农村大众》报的重任，任总编辑。1952年3月任《大众日报》社副社长（社长由省委常

委、宣传部长夏征农兼任) 兼第一总编辑，主持报社工作。对于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刘建得到党和人民的极大信任。1954年当选为省委候补委员。1956年7月在山东省第一次党代会上当选为中国共产党山东省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同年8月出席了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刘建办报勤奋、严谨。五十年代中期，为推动全省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的深入发展，亲率编辑、记者深入各地采访、调查研究，经常亲自动手写社论。1956年为报道莒南县旗帜社钮恩升民主办社的经验，带队前往实地，一住就是十多天，为写出篇得力的社论，常常彻夜不眠。同事们都称赞刘总不仅能干，文章的思路清晰、层次分明、逻辑性强。平时对每位记者、编辑的文章，他都迅速审慎地批阅、及时编排、见报。当时任报社办公室文书、后来长期任办公室主任的沈传义回忆说：那时刘建同

志作为报社主要负责人经常加夜班，平时不知疲倦地忘我工作着，总是春风满面，乐哈哈的。他不仅文思敏捷写得一手好文章，而且钢笔、毛笔字写得也好。对于版面设计、印刷工艺都有认真的研究，经常指导工作人员改进工作。

刘建平平易近人，善于团结共事同志，一起做好工作。逢年过节，他总是到各科室、各车间去走访干部、职工。对两名日籍印刷技术员，也总忘不了看望一番，使他们高兴安心地过好节日。省委配给他的专用轿车，他从不随便使用。为了工作方便，经常让办事的同志乘坐。作为省报的主要负责人，每天的工作是十分繁忙的，一旦业余却又十分喜欢打篮球，他给报社青年篮球队起名叫“星火”篮球队，并亲自题写“星火”二字，印在背心上，队员们穿破了再印，用了好多年。

刘建具有高度的党性原则和实事求是的作风。早在1952年《大众日报》社开展“三反”

运动时，据人揭发报社财务科有一名干部犯有贪污5亿元（旧人民币）的罪行。法院把拟判死刑的意见提到报社，刘建根据报社日常的经济能力分析，认为数额和实际可能不符，况且命关重大，建议实事求是地深入调查取证，经慎重审理，避免了错杀。省委指导全省革命和建设的重要社论，多出自刘建之手。而他写社论的依据，唯一靠“实事求是”，没有调查研究，没有把握充分的第一手资料（调查报告、新闻特写、通讯、人物专访录等），他是绝不草率从事的。因此，他写的社论，《人民日报》社也很重视，有时转载。

在1957年9月开始的报社整风运动中，刘建被错划为右派，同年10月不幸辞世。1979年11月，中共山东省委指示，撤销1957年11月省委对刘建同志所做的结论和处分，为其平反昭雪，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党籍。1992年4月，笔者专访了省委党史征委会主任

方正这位当年任《大众日报》社副总编辑的老同志（曾与刘建同志同被错划为右派），老人深有感触地说：“我和刘建同志同时从部队调入《鲁中大众》报社，长期共事，是知心的同志，要好的伙伴。几十年过去了，那段经历，没有使我动摇对党的信念。因为那时我和刘建都还年轻，能够在省委的喉舌机关担负重要职责，实感荣幸和责任重大。我们对党的事业是无限忠诚的，于心无愧。要说我和刘建不同的地方就在：他是一介书生，爱面子，怕丢人现眼，而我却是从山里打出来的土八路！”

昌乐县革命委员会 “五、七”干校始末

徐春友

为贯彻落实毛泽东同志的“五、七”指示精神，培养和造就合格的无产阶级干部队伍，以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经县委研究决定，于1975年4月成立了昌乐县革命委员会“五、七”干部学校（简称“五、七”干校）。

昌乐县“五、七”干校从成立到1979年年底结束，存在时间四年半。期间共举办学习班六期（每期四十人左右）、培训干部二百余名。昌乐县“五、七”干校，由建校之初的提倡干部队伍“亦工、亦农、亦商、亦学”，到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要求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

化”，而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干校之初，统一于县委党校党委领导之下。党校党委成员由赵新民（书记）、高仓（副书记）、张子平（副书记）、李国栋、李友信五人组成，责成张子平副书记分工干校的具体筹建工作。

干校筹备阶段，工作人员有：张子平（党委副书记兼校长）、刘锋（副校长兼理论教员）、王崇鲁（行政组长）、刘志先（会计）。干校地址定在孤山林场苗圃（昌乐镇东徐村东南方，王潍路以北），第一期学习班即借用苗圃的房子和生产基地。

干校的办学方针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五、七”指示精神，即“亦工、亦农、亦商、亦学”的精神，边学习，边劳动，学员来自县直党政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和有培养前途的中青年干部。学习内容基本是根据当时形势的需要，确定相应的学习文件和教材；劳动项目，主要是

校内建设和农林管理，如建房、种菜、麦田管理、幼树嫁接等。

干校于1975年5月7日正式开学。第一期学习班时间为六个月，除节假日外，实际安排156天，学习、劳动各78天。学习的主要内容是：毛泽东同志的“五、七”指示精神；中共中央〔1975〕23号、26号文件；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等著作。第二期学习班自1976年9月20日开学，1977年1月31日结业，共133天。其中：学习、劳动各45天，社会调查15天。学习的主要内容是：毛泽东同志关于社教运动理论问题的论述以及马、恩、列论无产阶级专政等专著。第三期学习班1977年2月26日开学，6月8日结业，共103天。其中：学习36天，劳动30天，社会调查10天，入学教育和结业总结6天。学习的主要内容是：毛泽东同志的《论十大关系》、《实践论》、《矛盾论》、以及华

国锋同志《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第四期学习班于1977年8月8日开学，11月8日结业，共93天。其中：学习35天，劳动30天，入学教育和结业总结7天。学习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和四个重要决议，两报一刊社论《历史性的会议》；毛泽东同志的《论十大关系》、《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等著作。第五期学习班于1978年1月8日开学，5月7日结业，共120天。其中：学习70天，劳动29天。学习的主要内容是：中共中央〔1977〕37号文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华国锋同志的十一大政治报告、新党章，叶剑英同志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等。第六期学习班1979年4月14日开学，8月25日结业，共134天。其中：学习75天，劳动45天。学习的主要内容是：中央领导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及

有关党的建设和整党整风的文章。

领导成员变动情况大体如下：1975年至1976年9月，张子平副书记兼校长、刘锋副校长；1976年10月，干校成立独立领导班子，刘正训同志任党委书记、校长，刘锋同志任副书记、副校长；1977年下半年，县委常委、组织部长王振禄同志兼任干校党委书记、校长，并增派杨全福同志任副书记、副校长；1978年至1979年10月，于桂海同志继任干校党委书记、校长。

工作人员有：理论教员刘锋、徐春友，行政组长王崇鲁，会计先后为刘志先、王义元、田胜之，保管员周连科，技术员李振禄，司机王明训等。

1979年底，干校撤销，其人员、财务、物资及设施等并入中共昌乐县委党校。

注：1968年至1969年期间，县革委曾在昌乐县繁殖场处办过“五、七”干校，不在本

文概述之列。

昌乐县烈士陵园迁建概貌

高瑞祥 刘曙光

昌乐县烈士陵园迁建3次。1956年至1970年在昌乐故城东今利民路县医院院内西侧，为建筑设施简易时期；1971年迁昌乐城东北隅荣（成）兰（州）、昌（乐）大（家洼）公路交汇处，为建筑设施较完备时期；1993年迁昌乐城东南临昌乐第一中学东北侧，为新建阶段，初具雏形。现将3个时期的昌乐县烈士陵园迁建情况分述如下：

（一）

为缅怀先烈，教育后人，继承和发扬先烈遗愿，建设新中国，昌乐县人民政府于1956年在昌乐故城东今利民路中段南侧人民医院院内

西侧建昌乐县烈士陵园 1 座。院落大致为方形，占地 8 亩。大门为南门，北邻利民路。四周为青砖方格透漏围墙。内有烈士墓 84 座，其中有 1946 年鄆鄆荣山子战役和朱刘店战役牺牲的外籍烈士，有 1948 年潍县战役牺牲的昌乐县籍烈士。墓前竖有青石小碑，载有烈士姓名，参战牺牲地点。墓地周围和空间栽有松柏树。设有小屋 2 间，有 1 人看墓。有青石四楞烈士纪念碑 1 座，高 3 米，正面镌刻着“革命烈士永垂不朽” 8 个大字，侧面有昌乐县人民政府撰写的碑文。这个时期的烈士陵园，为建国初期，在财力极困难的情况下筹建的，设施极为简陋，然而却显得非常静穆。

在筹建中，县政府极为重视，组织专门班子，克服财力困难，艰苦奋斗。请县建筑社刘汝清设计。设计一切从俭，讲求实效。纪念碑为旧碑改装而成。请于云武书写碑文。组织 6 人，由刘瑞光负责，用半年时间，亲赴潍城大

圩河，昌乐县的北黄埠，朱刘店等地，走访群众，打听烈士遗体下落。亲自扒遗骸，以小车载运。昌乐县烈士陵园建成，可谓是白手起家、艰苦奋斗的产物。

(二)

随着昌乐县城建设规划和烈士陵园扩建的需要，昌乐县烈士陵园于1970年8月将其迁于昌乐城东北隅四图村北，荣（成）兰（州）、昌（乐）大（家洼）公路交汇处东北侧埠岭高地处。初占地35亩，1986年扩为42亩，先后新建了牌坊式大门、凉亭和养鱼池。房屋达45间，固定资产达40余万元。由县民政局派负责人1人，有5—7名临时工。这个时期的烈士陵园为设施较为完备时期。无论从外观还是内部，人们看上去可谓引人入胜。举目观望外围，四周为花墙封闭，其中有雕栏花墙150米。自南向北穿越整个陵园，首先引人注目的

便是古典式牌坊外门。它座落在荣兰公路北侧，面向南，为牌坊式建筑，水泥结构，顶部黄绿色古式瓦块镶砌。宽12.4米，高7.5米，左右旁门分别题“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无论从色彩，还是规模，非同一般，人们到此总是领略一番，随之产生敬穆崇敬之感。由此向北20多米便是烈士陵园的重门。它为发悬式建筑，屋顶设有横排铁制1米见方的，十分醒目的“烈士陵园”四个大字。重门东西相连是办公室和接待室。步入重门内便是整个烈士陵园院落。南部是供人们游览观赏的风景区。其左侧辟有花圃鸟园。建有碧波池。面积约2亩。池中有假山，水面上浮三曲石桥，装有栏杆，桥面与旱路相通。有八角出檐的，远看似圆非圆的古式建筑凉亭1座，点缀其间。可谓鸟语花香，景色美丽，给人一种美的享受。东侧有花坛一方，花卉奇异。再东有花室，植奇花异草3000盆，并栽有松柏、杨柳等树350

余株。中部为纪念堂区。纪念堂南部为广场，砖铺地面，能容万人以上，是清明祭扫集合讲话的地方。广场北端便是纪念堂。系民族式大屋顶建筑，计5间，284平方米。内设3厅。正厅置一横匾，上题“死难烈士万岁”。两旁竖幅有毛主席题词“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牌匾两侧悬挂着中共昌乐县委、昌乐县人民政府敬献的挽联。陈列着烈士事迹和英名录，上面记载着660余名革命烈士的英名。有画面17幅，照片123张，烈士遗物4件，并有解说词。突出展出8位著名昌乐籍烈士的英雄事迹。有1922年加入中共原济南市委主要负责人李华亭；有抗日战争时期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中共昌乐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刘慈源；有参加过广州起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高级干部中共奉天（今沈阳）特委书记张适；有文革中坚持党的原则同林彪反党集团英勇斗争、至死不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国

防委员刘善本。纪念堂东西两侧为中共昌乐县地方党史展览，共展出文字说明 7000 余字，油画 73 幅。照片及资料影印件 123 件。展览生动真实地反映了昌乐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历次革命战争中向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英勇斗争的业绩。在西侧厅还安放着一十几位烈士的骨灰盒。最北端为烈士墓地。有陵墓 93 座，墓前立石碑 92 块，刻有烈士英名。其中有 8 座著名烈士墓碑，专请雕刻名师为其雕刻了生平事迹。有“四五”烈士李华亭，昌乐县第一届县委书记刘慈源，昌乐县党组织早期的著名党员刘焕彩。墓地中部有纪念碑 1 座，为青石制做的四楞石柱形，由原陵园迁此。墓地周围及空地期间栽有松柏树，给人以肃然崇敬之感。

整个烈士陵园，几经建设，设施较为完备，布局较为合理。凉亭、牌坊式大门等建筑，设计精心，制做精巧，加以奇花异草相衬，既有

观赏价值，又是革命传统教育的良好场所。每年清明节，机关、学校、当地驻军上万人前来祭扫，瞻仰人群络绎不绝。1988年1月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省级重点烈士纪念建筑保护单位，由昌乐县民政局管理。

(三)

由于开发区、宝石城建设的需要，烈士陵园于1993年迁县城东南1.5公里王家大山西坡，昌乐县第一中学东北邻，占地40亩。

现在的烈士陵园，大门向西临环山路。大门南北两侧为停车场，能容纳汽车40余辆。大门为牌楼式建筑，两侧石狮一对正在建设中。院内建筑布局分为3个区，即生活区、纪念堂广场区、墓区。当走进大门便是生活区，有办公室3间，职工宿舍10间，办公室前4个花坛，栽有黄杨、花草。办公室后有花窖1个，各种花卉千余盆。办公室后有1市亩的苗圃，

各种苗木 2000 余株。中部地带为纪念堂广场，烈士纪念馆正在建设中。建筑完毕，将原有的纪念物摆放于内。将摆展烈士英名录，铭记 670 名烈士。介绍著名烈士 8 个版面。用两个展室，展览中共昌乐县党史，展出画面 46 块，文字说明 7000 余字，油画 73 幅，照片及资料影印件 123 件。烈士墓区，位于纪念馆以东。占地 10 市亩。已迁葬 93 位烈士遗骨，竖碑 92 块。其中有“四五”烈士李华亭，昌乐县第一届县委书记刘慈源，昌乐县党组织早期党员刘焕彩、刘焕奎、王永升、刘智堂等 8 位著名烈士墓。墓区当中有小型纪念碑 1 座，由原陵园迁此。墓旁植有松柏树，庄严肃穆。墓区南端建有骨灰堂，面积 120 平方，为群众寄存骨灰提供方便，现有骨灰盒 500 个。

现有工作人员 6 人，其中负责人 1 人。整个烈士陵园当前初具雏形，尚待进一步完善，拟在纪念馆东建纪念亭 2 座。随着财力的充

实，新的烈士陵园将会大有改观。

解放前后的 剧场与戏剧团体概况

于令珠

(一) 剧 场

昌乐文化历史悠久，戏剧历史渊源流长。旧县城虽不大，但古建筑（庙宇、牌坊等）却是相邻诸县中较多的，其中戏楼就是解放前最早的一个固定演戏场所。其原址在旧城隍庙对面（现县政府对面文化馆楼西段）坐南朝北，台高约两米，台基四周由青石砌成，砖铺台面，面积约六米见方，楼总高约七米。东西北三面无墙，南墙开出将入相两门，连接台后房屋数间，供演员化妆休息之用。台面四角各有青石柱顶立，亭式结构，前两檐角跷起，悬挂风铃，青瓦盖顶。远望外形酷似凉亭，楼前空场可容

万人露天看戏。每逢春节、五月二十八山会、春旱祈雨、县太爷过生日及富贵人家孩子许愿、还愿都请戏班在戏楼唱戏。

至于该楼初建何年众说纷纭，有说在清朝康熙年间（1662—1736年），有说在乾隆年间（公元1736—1796年），有说清道光年间（1821—1851年）。有的老人曾见重修戏楼碑记，也只是笼统的说重修在清代。到底初建何年？因证据不足，难下结论。

日本侵华战争开始后，因时局动荡久废不用又无人管理，致使残缺破漏。解放后一九五一年拆除。该戏楼是在相邻诸县中独有的，是昌乐较早的固定演出场所。现虽已荡然无存，但可足以说明昌乐戏剧历史之悠久。

解放后人民政府成立，对人民的文化生活非常关心，一九五一年由县工商联集资在东关路东（现职工俱乐部西邻）盖一戏院。因资金所限，只以竹竿为檩麦草盖顶，扎席当墙，叫

“新昌戏院”（百姓叫它席棚戏院）。东西方向朝北开门，舞台位西。院内埋木柱钉板为凳，可供八百人坐着看戏，每逢著名演员来昌演出，卖票多至千余人，戏院常常暴满，因席墙不牢，常常塞破戏院子。“新昌戏院”虽设备简陋，却风雨无阻，终究是结束了露天看戏的历史。

随县城扩建，原东关戏院因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多年使用已破旧不堪，不适应形势发展和广大群众的要求。一九五九年由县京剧团投资，将烟棉收购站的大屋改建为“人民剧场”（原址在县招待所院内）。剧场中间置靠背联椅，两边是木凳，可容纳一千四五百人看戏，剧场南北向，舞台位北，大门朝南，前后台设备较完善，加之食宿条件较好，除本县剧团演出外，常接纳外地剧团来昌演出。与新昌戏院相比是更上一层楼了。

一九七〇年又建造了宽敞宏伟、设施齐全的大礼堂。是个多用途的场所，既有池座也有

楼座，可容纳千余人，成为昌乐县发展史上空前高档次、高格局的剧场。因连续使用二十五年，超过了建筑安全期限，为防意外于一九九五年拆除。相信随着两个文明建设的发展，必将会有档次更高，设施更完善更现代化的剧场出现。

（二）专业演出团体与业余文艺队伍

解放前被上层社会、达官贵人称为“下九流”的艺人，政治上受歧视，生活上无保障。以唱戏谋生的专业艺人，终年奔波于城乡之间，颠沛流离，过着艰苦清贫的生活；解放后政治上翻了身，成了国家演员，工作环境、生活待遇、社会地位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有的当了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彻底摘掉了“下九流”的帽子。

1、专业团体：

解放前有一个常年活跃在昌乐、寿光、临朐、潍县一带演出的戏班叫：“三庆班”。她是以张庆、肖庆、王庆三人名字而起班名的，与滕亮等六人于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在昌乐搭班唱戏。《铡美案》、《九江口》、《大保国》、《玉堂春》、《狸猫换太子》等十多出戏是该班的主要剧目。花旦李福庆、武生崔德生、老生崔德三、武生宋春玉、女旦角宋翠玉等在群众中有着较大的影响。所到之处都受到群众的欢迎，是昌乐最早的一个行当全剧目多的专业文艺团体，鼎盛时期戏班多达六十余人。一九三七年因战乱被迫解散。

另一个较早的文艺团体是一九四二年赵丰祥在南郝埠南庄成立的京剧科班。他以教戏为主演出为副，是昌乐历史上第一个科班。该班聘请了马春吉、赵全和、孙玉水、张贺仁四人教生旦戏兼教练武功。后来昌乐京剧团的司鼓周文、琴师黄永乐就是该班场面人员。因赵与

上司不和于一九四五年解散。该班虽时间短暂，却培养了不少的优秀演员，解放后部分学员参加了昌乐京剧团。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文艺的发展，一九五一年在文教科长郑绪山的倡导组织下，将原潍坊“永乐”剧团十三人留在昌乐，又召集流散艺人三十余名，组建了“新昌剧团”（后改名“昌乐人民京剧团”）。

主要演员有：老生韩文礼、长靠短打武生周镜明、旦角吕桢祥、花脸毕奎、花旦赵涵萍、还有李观行等。场面有：司鼓周文、琴师黄永乐、张景全、黄庭礼等。当时演出的主要剧目是：《打渔杀家》、《群英会》、《盘丝洞》、《玉堂春》等十余出戏。

由于当时演员力量薄弱，又受诸方面条件限制，难以长期固定演出，靠接外地著名演员来昌以维持常年在剧院演出。

解放后由于地方戏曲迅速发展，一九五九

年由李益更负责，从历届汇演中选拔了优秀演员三十余人，组建了“昌乐吕剧团”。这是昌乐解放后第一个演地方戏的专业团体。

演出的剧目多以古装戏为主：《王定保借当》、《罗衫记》、《秋江》、《龙凤面》、《借年》等，现代戏有《李二嫂改嫁》等。

2、 业余文艺队伍

解放前后差不多各乡镇都有群众自发组织各种形式的业余文艺队伍，他们有着固定的职业（绝大部分务农），忙时干活，闲时演戏。每逢年节、婚丧嫁娶、庙会被邀去吹打弹唱，以增加气氛，演一些喜闻乐见的节目，活跃满足人民群众对文化娱乐的期求。

解放前后在我县流行较广的有京剧、茂腔两个剧种（在我县有南茂北京之说），另外还有吕剧、黄梅、梆子等。

有较大影响的是：清光绪年间成立的亓家

店子茂腔子弟班，宣统年间成立的西双庙子茂腔子弟班，活跃在县城中心以高明德、冯桂中为首的东北村京剧子弟班，尧沟北郭一九三五年成立的京剧子弟班，埠南头一九五〇年成立的茂腔子弟班。另外还有王俊业余剧团。

这些子弟班演出的剧目很多：《武家坡》、《甘露寺》、《闯帐》、《金刀记》、《汾河湾》、《五女会》、《拾玉镯》等。他们是各有千秋，常常巡回演出在乡村，有时出县，被百姓称为“大戏”。他们扎根在农村演出在农村，深受群众的欢迎。

除自发组织的子弟班之外，还有政府机关组织的业余宣传队。

解放前昌乐县委书记赵西林，为了更好地开展对敌斗争，一九四六年在临朐高家庄子、尧山一带成立了一个十八人的文工队。演出的《兄妹开荒》、《送子参军》、《送郎参军》、《纺棉曲》、《王老五减租》等节目，

对当时反奸、诉苦、减租、减息斗争这一政治中心工作的开展，起到了枪杆子起不到的作用。

解放后在县文化馆馆长董秀亭的组织下，于一九五四年成立了第一个近三十人的业余宣传队。该队演出节目形式多样：吕剧、黄梅、快书、器乐合奏等。为了配合当时的农村互助组合作化这一中心，排演了吕剧《光明大道》、器乐小合奏《快乐的农村》。另外还排演了黄梅戏《打猪草》、《夫妻观灯》、《双推磨》

（该戏邵丽影、陈剑秋二人在一九五四年省汇演中获一、二等奖，剧照刊登在大众日报）等节目，一九五五年秋到乡村巡回演出。对当时中心工作的开展起到了有力的宣传和推动作用。同时又为地区吕剧团培养了部分专业人才。

一九五六年董秀亭调往潍坊后，县文化馆长吴杰又重新组建了文艺宣传队，在原来基础上增添排演了许多节目，继续为广大群众演出。

从此，在县文化馆有计划地组织县会演的推动下，各乡镇、机关的业余宣传队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

文学艺术的兴衰决定于经济基础，昌乐解放前因人民生活困苦，虽有几个子弟班总是处于长期贫乏、萧条状况；解放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人民生活日益提高，文艺团体迅猛发展起来，彻底改变了文艺匮乏现象，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文艺队伍多、剧种剧目多、节目形式多的繁荣昌盛局面。

昌乐医药事业的沿革与发展

赵 健

昌乐古称营丘，地处山东省中部，为西周太公吕望之封地，历史悠久，医药事业源远流长。1985年我县进行了药源普查，确定全县共有主要地产中药材148种，蕴藏量70万公斤。半夏、山楂、枣仁等为地道药材，驰销各地。县内五图四泉山建有唐代大医学家孙思邈的“药王庙”，元代曾为其重修（解放前夕尚保存完好，经文革遗迹已不复存在）。昌乐医药事业由传统的中药小本经营发展到现在的中西医药、医疗器械、化玻的规模经济，大体经历了三个历史发展阶段。

(一)

昌乐私营中药商业历史悠久。有据可查的有1755年（清乾隆20年）开业的乐闲堂（北展乡高家庄），十代相传至今，逾二百余载。到十九世纪末，昌乐已有泰和堂、广和堂、立人堂等中药店铺九家，小本经营。进入二十世纪后，德国帝国主义为掠夺中国资源而修建的胶济铁路从县境内通过，交通条件的便利为昌乐商业带来了繁荣，传统的中药业有了新的发展。1937年县内大小中药店60余家，其中县城内有中药店堂十余家。较大的药店兼营批发行栈。日军侵占昌乐后，日伪统治者横征暴敛，敲诈勒索，草菅人命，药业亦受其害，生意萧条，有些小店关门停业或转入乡下。1945年底仅剩42家。

1948年，昌乐的中药店堂在城东关设有仁德堂、广和堂、瑞生堂，城南门设有泰和堂、万生祥、人和，城西门有遵古堂，城里有仙芝堂等。坐堂、寓医、药医结合是昌乐县中药店

堂的传统经营方式。一些药店的掌柜，既是商业经营者，又通医道，为患者切脉看病，就店取药。昌乐镇西管庄泊静堂的郗澄然、仙芝堂的马连诚在县内颇有声望。店内无人行医者，则聘请名医坐堂应诊。应聘医生除享有患者付给的脉理费外，店主视生意的好坏给予一定的酬金。1948年前昌乐的85家零售药店，12家有坐堂医生。城东关“广生堂”药店，1921年开业，聘请本县名医郗秋蒲坐堂，为患者诊病切脉，郗先生是祖传世医，医术根基深厚，先跟其伯父学习痘疹，后又攻研内科，对妇科疾病尤为擅长。1936年，全县中医汇集一堂应试，郗秋蒲独占鳌头，名列榜首。附近邻县、乡、镇患者慕名前来求治者颇多。广生堂药店因有这位名医坐堂，生意颇为兴隆。

解放前，昌乐尚无大面积的中药材家庭种植。群众零星采集的中草药，除自留备用外，一般出售至当地中药铺店。中药铺店的饮片炮

制加工，多为遵古炮炙，炮炙过程均由手工操作，工效甚微，但多以加工细致、制作考究，以优取胜。85家中药零售店堂中有62家制售成药。泰和堂的“鸡肝散”、万春堂的“金蚣丸”、仁德堂的“六味地黄丸”，同仁堂的“天王补心丹”均有较高声誉。

昌乐西药业始于1904年。胶济铁路通车后，外国教会相继入侵，在城里修建了天主教堂，传教士进行宗教活动，并带来了西药。1930年由山东医科大学毕业生高兰馨等人组成的第一家西药房—德生医院开张营业，西药西医正式进入昌乐。德生医院从业人员7人，资金1500元，地点设在县城东门里。

1938年，西药店增至7家，1947年底增至20家，全属独资经营。店主本人是主治医师，来源于医药学校、教会学院或军队。货源多从潍县、青岛西药店购进。药价昂贵，遇有紧缺药品随市易价，一物多价，甚至数倍相差，

曾有“抹抹红药水，留其一头牛”之说。一些小药房则因资金短缺，只能勤进快销维持门面。

解放前的西药店，开设较早的还有1933年徐孟尧在城南门里开设的“寿康医院”，从业人员7人，资金1000元；1935年李音绍在城大十字路口路西开设的“协和医院”，后改名为“协和药房”，从业人员2人，资金800元。另外，旧政府1935年在南郝河南村成立昌乐县医院，院长尹连增，有9名医护人员；1946年，在城关北流泉成立昌乐县卫生院。

(二)

1948年5月，昌乐全境解放，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政策指引下，昌乐县的医药商业日趋繁荣。同月，第一家由政府领导的县级卫生所在昌乐城里天主教堂和赵氏祠堂内成立。1950年全县中、西药店增至140余家，从业人员261人。其中，城里东门

又增设了同德堂、恒茂堂、务本堂等中药店，王元升诊所等西药业商户，此外，城镇集市上游医药贩亦时有可见。

昌乐县较有声誉的药店，是昌乐城南门里的泰和堂药店。业主王玉振，原籍安丘，1879年来昌乐开业。1938年日伪军占据昌乐，只开一个东门，交通不便，生意萧条，无奈迁入城南关经营。1948年昌乐解放，即迁回原址（南门里），该店获得新生，整理门面，重新开张营业。在党的工商业政策指引下，生意日趋繁荣。

泰和堂药店做生意十分讲究和气生财，童叟无欺。顾客临门概以笑脸相迎，热情相待，来有迎音，去有送语。柜台配方细心谨慎，先审方有无相反相畏及有毒药品，抓药时根据处方每味药的分量和要求（炒、炙等）一剂一称分别各包，并在药包上注明先煎、后下、冲等字样，并向顾客反复交待；抓完后复核药名、

分量，有无遗漏，确系无误，交给顾客，同时按处方要求交待自加药引（葱、姜、大枣、黄酒等）。有时店主还陪同买主进餐。泰和堂注重信誉和质量，赢得了顾客信赖。

在日常营业中，抽空自制各种羔、丹、丸、散，计有三十种之多。如补心丹、六味地黄丸、金匱肾气丸、保安万灵丹、镇惊丸、拔毒羔、益元散等。为方便群众用药，代客加工。夜间留人，随叫随开。

对饮片加工，精益求精。如半夏、槟榔、熟附子等，片薄如纸，整洁美观，严格遵古炮炙。遇到经验良方，随笔记录（如牙痛、气管炎、贫血、调经、腰腿痛、药酒等方），并介绍给有相似病状的病人试用，有时颇见疗效。该店自制的鸡肝散，又名消肝散，处方如下：炉甘石五钱、滑石五钱、海漂蛸五钱、石决明半两、朱砂半钱、雄黄半钱、梅片少许，用公鸡肝三个，每个肝包药末五分，用米疳水煮，

内服，专治小儿疳积（俗称奶皮子），深受群众欢迎。

进货多由潍县、青州等地。为了扩大业务，招徕顾客，在购销方面均有赊销方式，按每月结算，或到年底决算，零售也是同样，每年交腊月前派专人登门讨帐。1938年前，该店共父子五人，资金达3000多元，经营品种达800余种，销售额每月900余元。

1950年，徐振玉等10人在高崖街成立医药联合社，主营中药批发后兼零售。1955年12月县供销社设药材经理部，经理宋连明，从业人员7人，有门市三间仓库五间，中药批发资金三万元。这是我县成立的两家医药经营集体机构。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深入开展，全县中、西药店未经公私合营而分别一步过渡到国营企业和联合诊所。1956年8月，县供销社药材经理部与城里的泰和堂、恒茂堂、仙芝堂、

务本堂等4家中药店合并，成立昌乐县药材公司，刘振山任第一任经理，李寿令任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公司统一经营中西药品、医疗器械，商品销售的对象是各级医疗单位和零售商户，县公司批发部和各基层经营组划分经营区域，分片供应。先后在高崖、尧沟、朱汉、平柳、鄌鄌、马宋、乔官、阿陀、平原、北展等地接收或组成基层药品经营组和零售店。1984年元月，县公司升格为科局级单位，隶属潍坊市药材公司。此时，公司共下设昌乐、鄌鄌、马宋、乔官等四处批发部组和四个零售门店。1985年商品总销售454.3万元，其中批发业务占91.7%，市场零售占6%，收购调潍坊药材站占2.3%。

昌乐县1985年建立第一处药材生产基地，地址在城关马家庄子，种植药材200余亩，自此开展“南药北移、北药南植”活动，先后引种试种、变野生为家种，家养获得成功的有

40余种。1978年三中全会后，农业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种植有了自主权，家种药材猛增至1300余亩。1984年药材种植面积达1460余亩，产值35.8万元。1983年王俊乡崖头村开办家庭养蝎场，三年收入五千多元。为人工养蝎创出一条新路，受到县、乡各级政府和有关单位的重视。建国后，公司设收购门市部，县、区、乡供销社设采购站、代购点，收购办法按季节排品种，进行三定：定点、定人、定数量。中药材的收购调出均按潍坊药材站计划实施，除内部调拔少量外，其余调至潍坊药材站。1981年至1985年调出的主要品种有：黄芪、生地、元参、菊花、沙参、桔梗、半夏、黑芝麻、丹参、大青根、芥稞、草决明、白芷、枣仁、柏子仁、远志、茵陈、坤草、艾叶、槐米、山楂、鸡内金、翻白草、薄荷、狗鞭、驴皮等。1985年调出124013公斤，总金额197796元。公司先后成立制药厂、饮片加工组，

切制饮片、分装部分中药。1971年，公司第一次从临清购置饮片切药机一部，从此电动机械切制中药饮片代替了手工操作。公司中药饮片都是内部调拨，据1985年调查，中药饮片加工炮制14039公斤，占中药材销售的16.84%。

从建国到1984年间，昌乐医药公司的医药经营购销比例基本平衡，但由于1958年受社会上“浮夸风”的影响，医药商品亦盲目购进，造成积压，变质报废，通过1961年商品“三清”，报损金额68000余元。十年的“文革”动乱及1976年搞的高计划、大指标，使购销比例基本失调，又一次造成经济损失83000余元。

(三)

1984年医药业进行改革，任务承包到各经营部组，责任到人，药品可就厂进货，敞开供应，跨区销售，医药紧缺品种减少，购销额大

幅提高，医药业出现了欣欣向荣的繁荣时期。1988年，公司管理实行经理负责制。这以后的数年，我县医药经济实现大膨胀，1991年实现销售2200万元，比1988年翻了两番。1993年，潍坊市医药行业实行股份制改造，把企业进一步地推向了市场。

1996年，县公司发展到中、西药五个批发部组，十个零售门市部，分设在县城、鄌郚、马宋、红河、阿陀等地，负责全县地产中药材的调拨及外地的医药供应。在县委县政府、市公司的双重领导下，县公司积极开展购销业务。至1996年底，昌乐医药国营商业共有职工109人，经营医药商品2200余种，利税80万元，总购进额1750万元，总销售2120万元，分别为1957年的17.9倍和17.5倍。

据统计，新中国建立以来，昌乐先后发生中毒、车祸、煤尘爆炸、急性传染病等较大抢救事件二十余起，县公司积极配合防疫、卫生

部门，做好防治药械的供应，保证了医疗的需要，人民健康水平大大提高。1984年企业改革后至1996年间，实现商品总销售16500万元，利税900余万元，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我县西药生产起步较晚，1984年国营昌乐县药用淀粉厂竣工投产，年产药用淀粉1500吨，白糊精150吨，主要供应新华、潍坊第三、青岛黄海、莒南等制药厂，该厂设在昌乐城利民路东首，人员50人。1988年新上葡萄糖生产线，投资1200万元，1990年开始投产。1991年改称潍坊市第五制药厂。到1996年底，发展成为年产值4750万元，年销售5000万元，固定资产2200万元，年利税380万元，职工500人的国有中型二级企业。

1997年1月，昌乐县医药管理局在原昌乐医药公司的基础上组建（并与公司并存）。我县的医药生产、经营工作初步走上法制化轨道。昌乐的医药事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越来

越显示出它的重要作用。

昌乐名医王华村

赵守诚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昌乐县有一位以针灸而闻名县内外的著名医生，他就是1905年出生于本县昌乐镇东徐村的王华村。华村是字，名为景明，1959年去世。王华村自幼天资聪慧，勤奋好学，1927年考入青岛针灸专科学校，1930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回到昌乐在县城办起诊所行医。他惯于粗茶淡饭，也不好讲究穿戴，只是爱书成癖，余钱多用来买医书和医疗器械。他没有娱乐爱好，有时间就看医书，钻研医疗技术。其座右铭是“学理无穷，技术无精，活到老学到老。”在生活和医疗实践中也是这样做的。他主攻针灸，兼攻外科和产科，经常到集市上买些小狗、小兔之类的小动物进

行解剖手术试验。治病过程中经常针灸与药械并举，治愈过许多疑难病症和危急患者，是当时群众心目中的县内医界高手。

王华村在群众中威望高，不仅因为他医术高明，更因为他医德高尚。对求医者，有钱的他给治，没有钱的他也同样给精心治疗。有来请出诊者，不论白天黑夜，阴晴雨雪，他都是毫不犹豫，立即前往。有的病人家境贫困，看了病却没有钱，他就帐也不记，不再收取。因而很受群众尊崇，三十多岁即已德高望重，誉满县内外。

王华村是学针灸出身，毕业后又继续刻苦钻研，因而针灸技术日臻精湛，多次攻克顽症。1934年县城一吕姓病人患打嗝病，一天到晚连声打嗝不停，觉不能睡，食水难进，腹内饥饿难忍，喉咙却连声打隔不停，求过多位医生都没见效，最后来求王华村，王医生见他根本咽不下药物，就找准穴位，果断下针。结果，几

针刺下去，很快嗝停气顺，平静如初。并且一次根治，没再重犯。1937年东南村一刘姓壮年患中风不语，半身不遂数月，晚秋时忽然加重，昏迷三天不醒，脉力衰竭，王华村被请到后，见已喂不下药，打针也难以吸收，即下决心针灸，先从头部下针，同时针着七八个穴位，终于使病人苏醒过来，后连针半年，辅以打针服药，使病人由长年卧床好转为能下床站立，拄杖行走。最后竟弃杖而行，生活自理。县城一秦姓干部，腹部胀闷，终日吃不下饭，却挺着个肚子老大，中药西药用了好多，都不见效。经人介绍，来找王华村针灸。王华村给他连针两天即腹缩如初，食欲渐振，体力逐增，一天天康壮起来。一个小男孩已十一、二岁了，却个子矮，身躯瘦得三根筋挑个头，皮包着骨头，面色蜡黄，头发干焦，挺着个肚子老大，象揣了个篮球。肚皮青筋暴露，成天低头蔫脑，浑身没劲，只是爱吃棉絮，穿棉袄撕开棉袄吃，

盖被子撕开被子吃，棉絮吃净就吃布条。王华村诊断后，认定是肚内有大量蛔虫所致，对症处方，服以大剂量药物，配合多穴位针灸，果然当夜奏效。第二天开始拉蛔虫，拉出的蛔虫有筷子那么粗，好多竟老得黑了头，拉了有两盆，最后又拉虫卵结成的小肉袋，连治了三个疗程后，小孩食欲大振，身体逐渐康壮起来。一年后，其父领着他来看王华村，满怀感激地说：“我是特意领着他来请王先生看看，这就是当年那个病孩子”，此时那孩子已头发油黑，面色红润，肌肉丰满，体魄健壮，成为一个十足的健康少年。

外科手术是乡村医生常遇的重要课题。在长期医疗实践中，王华村刻苦钻研，勇于探讨，外科手术技艺愈来愈高。一个病人长大背，脊梁上烂了个坑子，已烂到了内膜，送到潍坊乐道院，乐道院不收，不得已来求王华村，王华村先给他割下周围的烂肉，竟盛满了两手术盘。

术后针剂注射，内服外敷药物齐攻，终于使伤口愈合，病人康复。车站一居民，只有一寡母拉一小儿度日，无职业收入，只靠那十二、三岁的孩子去铁路上拾炭卖钱糊口，生活非常贫困。1944年夏，那孩子拾炭时，不幸被火车压断一根胳膊。疼得碰头打滚，死去活来。其母来求王华村，王华村赶去一看，其断臂的骨肉已被压烂，没法保全治愈，只有锯掉才能保全性命。经得其母同意后，立即动手麻醉，将其断残部分锯掉，用药物尽心治疗，前后用三个月时间伤口才愈合完好。王华村知其家境贫寒，就没收一文医疗费，受伤母子不胜感激，街坊邻居也都同声称颂王华村的高尚医德。由于时代局限，当时王华村诊所条件比较差。但有时由于病情需要，他还不得不在比他的诊所条件更差的地方动手术。一次他应邀到寿光东方一农户家去看病，病人患的是急性阑尾炎，情况十分危急，已不允许等送到诊所来治疗，

他和病人家属商量了一下，当机立断，就在病人炕上开始了手术。条件虽差，但由于他用心精细，技艺高超，结果手术很成功，病人很快转危为安，逐渐康复。

由于多方面条件限制，当时出生婴儿夭折率很高，并多有危及产妇者。为适应农村需要，解救母子难产之危，王华村也兼攻了助产。经过不断的实践和总结经验，助产技术日益提高，成功处理过多例难产病例，成为颇受欢迎的产科医生。

临朐县一产妇分娩时，小孩只下来一只手，却怎么也生不下来了。第三天晚上，请了一位助产士去，硬用产钳往外夹，把产钳也别断了，也没夹出来。产妇疼得昏迷了过去，产妇家属近乎绝望时，听说昌乐有个王华村善接难产，就慕名远道来求。王华村赶到后，见惨状，认为硬拽那手是拽不出来的，就加了润滑剂，把手伸到子宫内拽着小孩的腿，使小孩一转身，

把那外露的手调了回去，终于把小孩产了下来。虽小孩已死亡，但昏迷两天的产妇却逐渐苏醒过来，保住了性命。东乡一产妇难产，当时正雨雪交加，道路泥泞。家人迫于病势来找王华村，但却担心着：这么恶劣的天气，20多里远，能请动人家吗？没想到来到王华村家一说，王华村二话没说，收拾好器械，打上伞就走。赶到时他浑身都淋透了，产妇家属感激不已，忙拿出过年的新棉衣给他换上。他顺利把婴儿接下，确保了母子平安。由于王华村善接难产，当时北到寿光东方、纪台一带，南到高崖、平原，凡是难产，多数专程来求，王华村总是欣然前往，顺利接下，母子平安。先后由王华村接下的难产婴儿不下千名。

由于王华村医术高超，医德高尚，尽心尽力救死扶伤，济世救人，四方群众对他十分崇敬，有口皆碑。寿光纪台一带竟称他为“活神仙”，1946年70多号人一起敲锣打鼓，吹着

大喇叭，用轿抬着匾来致谢，匾词为“医冠中西”。他们不但亲手把匾挂在王华村的大门之上，并大摆了40桌酒席，广请昌乐各界名流同声颂扬王华村的医术医德。当时赠予王华村的镜匾难以数计，格外精致庄重的有外县送的“华佗再世”、“扁鹊复生”和昌乐县工商联送的“妙手回春”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关于营丘问题的复信

赵 守 诚

1983年10月，我曾收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复信，明确表示古营丘在昌乐。去信的大体经过是：

西周齐国古都营丘，素有昌乐、临淄二说。历史学家也意见不一，郭沫若主临淄，范文澜主昌乐。

1982年秋，我到县史志办参与编修《昌乐县志》，在学习修志、了解昌乐历史沿革中，逐渐体察到解决这一问题的迫切性。因为古营丘在昌乐，昌乐的历史沿革是一个写法，若不在昌乐，则完全是另一种写法。迫于修志任务的迫切需要，我决定对营丘问题认真探讨一

番。

对史学，过去我从未特意用过心。如今要考证营丘地望，我只好先从旧县志开始，经翻阅明嘉靖、清嘉庆、民国三个版本古《昌乐县志》，上面都说昌乐即古营丘地。进而找来《青州府志》、《山东通志》对照来看，两志也是一辞说营丘在昌乐。除了志书还有什么书有这方面的内容呢？因自己对这方面的知识所知甚少，当时除了查找有关的志书之外，我又找来好多史书翻阅，终于又在《太平寰宇记》中翻到营丘是在昌乐不在临淄的内容，进一步坚定了我主昌乐的信念。

昌乐人主昌乐，赞颂昌乐的光辉历史，顺乎情理自然。但我深知要说服别人，必须有充分的具体的证据。为了证明有关志书和史书关于营丘在昌乐这一观点的正确性，我和刘良华同志特地去马宋公社以及古城、营丘等村进行实地考察。并在古城村召开了有多位老人参加

的座谈会，他们谈了“瓦碴子地”的来龙去脉，啦了姜太公庙的宏伟壮丽，介绍了许多关于古营丘的佐证。结合在典籍中找到的论述，我认为“古营丘在昌乐”这一论点的证据比较充分了，就综合了一下，写成一篇短文，陈述了论点和论据，寄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请教。月余以后，便收到了历史研究所的回信，信中说“我们请陈可畏同志给你作了解答。”同信附着陈可畏同志解答文，文中既叙述了营丘问题分歧的由来，也介绍了考证营丘问题的一些脉络，最后明确肯定“我们认为你的营丘在昌乐县境之说是正确的。”复信不但观点明确，而且态度严谨，连涂改的地方也不是一勾了事，而是用方格纸贴好以后另写的。

得到这个回复，我心里踏实了，又补充了些资料，如在地名办工作的闫其昌同志介绍的营丘外城门遗迹等，仔细组织了材料，写成一篇论文，发表在《中国地方志通讯》上，题目

是《整理旧志要注重考证》。后又经加工深化，写成《齐都古营丘试探》，发表于《东岳论丛》1986年第二期上。后来有张达民和王恩田二同志主临淄，撰文指名和我商讨，我即根据他们所提疑点，写成《齐都古营丘续探》发表于曾发表张、王二同志文章的《管子学刊》1992年第一期上。我的文章题目之所以标明“试探”、“续探”，目的是准备再有争论者，我便“三探”、“四探”地与其继续探讨下去，但此后再也没有看到争论这个问题的文章。

附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复信。
赵守诚同志：

来信已悉，关于齐国建都问题，我所陈可畏同志给您做了解答。仅供参考。

致

礼

历史研究所

1983年10月1日

附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陈可畏同志的解答文。

赵守诚同志：

来信早就收到了。因为工作忙，今天才回信，实在抱歉！

关于西周齐国最早的都邑营丘故址在何处？自来有两说：一说在今淄博市临淄北临淄故城内，一说在今昌乐县城东南五十里。《汉书·地理志》齐郡临淄县下注云：“师尚父所封。……应劭曰：‘齐献公自营丘徙此’。吕瓚曰：‘临淄，即营丘也。故晏子曰，始爽鸠氏居之，逢伯陵居之，太公居之’。又曰，‘先君太公筑营之丘，今齐之城中有丘，即营丘也’。师古曰：‘瓚说是也。筑营之丘，言于丘地筑城邑。’”同书在北海郡营陵县下又注云：“或曰营丘。……应劭曰：‘师尚父封于营丘，陵，亦丘也’。吕瓚曰：‘营丘，即临淄也。营陵，春秋谓之缘陵’。师古曰：‘临

淄、营陵，皆旧营丘地’。”由于营丘在临淄故城外城中之说始于《晏子春秋》，而汉至唐的许多名家和地理名著均从其说，遂成为传统正说。但是历代两说争论不已。

究竟哪一说正确呢？这要从早期的史书记载来考查：

《史记·齐太公世家》：“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师尚父于齐营丘。东就国，道宿行迟。逆旅之人曰：‘吾闻时难得而易失，客寝甚安，殆非就国者也’。太公闻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国。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营丘边莱。莱人，夷也，会纣之乱而周初定，未能集远方，是以与太公争国。”太公六传至胡公，“徙都薄姑，而当周夷王之时，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与其党率营丘人袭杀胡公而自立，是为献公。献公元年，尽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临淄”。由上可以看出：一，营丘距位于胶东地区的东夷大国莱国很近。二，临淄和营丘

决不在同一地点。因为同一地点不可能同时两个名称。此外，在临淄故城内，考古工作者没有发现齐献公以前的文物，可见，营丘故址在临淄故城内之说是错误的。

营丘故址应在今昌乐县城东南五十里。春秋时名缘陵。‘缘’实为‘营’音之转，‘陵’即丘。至汉改置为营陵县，‘营陵’实即营丘。其地接近胶东故莱国，故胡公避免威胁而迁都薄姑；献公夺取政权之后，以薄姑为胡公的根据地，遂复东迁，不敢复都营丘，遂选择位于淄水西岸的临淄作为都城，以防御莱人的突然袭击。不仅许多地理名家和名著提到营丘在昌乐东南五十里，而且营丘故城内还有姜太公墓等遗迹、文物，足见其说可信。

总之，我们认为你的营丘在昌乐县境之说是正确的。

兹不一一，就此简复。

此致

敬礼

陈可畏

1983. 9. 4.

昌乐县营丘故城考

阎其昌

营丘故城：原分“外城”、“内城”、“皇城”三廓。原外城建有东、西、南、北四城关。《昌乐县志》载：“营丘故城，类今燕都制度，原有外城广袤二十余里。”城垣已塌无迹。据考：东门，即古城村东十五里，今坊子区范家庄东北隅里许，原有东门石碑为记；西门在古城村西五里，北申明亭村西南“女娲庙”处，原庙碑记有：“古城西关西门外，女娲娘娘庙”字样；南门在古城村南十二里，高家辛牟村东南隅“府君庙”前，现存南门石碑右上一角为记；北门在古城北六里，潍城区张、陈官庄村附近。符合周初：“列地封国，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三品之制

的制度（周里小于今里）。

内城：旧雉堞成正方形，广袤为一千五百米，即古营丘城址。城垣周长十一点二华里，今称营丘古城遗址。《周礼·坊记》云：“都城不过百雉”（每雉三十丈。）今内城实际为一百五十雉。现今仍存有四千五百米、宽十五米之城垣残迹。位于今河头镇东里许，白浪河西岸；今营丘村西二里处，金钗河北岸。距昌乐县城东南二十四公里，北纬 $36^{\circ}34'$ ，东经 $119^{\circ}02'$ 。嘉庆版《昌乐县志》古迹考云：“古营丘城，岂太公之所筑。仰汉时，因太公之旧，而筑之欤。”今古城村即古皇城。原有太公祠，唐朝长寿年（公元692年）建。及八角琉璃井即皇井遗迹。皇城南门外，原有汉朝隐士逢萌墓道碑，今徙置古城村东南角处。皇城北门外，原有唐朝嗣圣十八年（公元702年），北海县令窦倓，凿渠遗址和窦公渠碑。

营丘故城，在齐鲁境内，属古老地区之一，

据考已有四千五百余年的历史。唐杜佑《通典》载：“黄帝方制天下，立为万国。颛顼之所建，帝喾之所授，创建九州。少昊时（公元前 2590 年）爽鸠氏已居营丘。”《太平寰宇记》载：昌乐东南五十里营丘，本夏邑，商以前故国。当少昊时，有爽鸠氏；虞夏时，有季荊（音：立）；汤时，有逢伯陵；周以封太公为营丘。”《山东通志》载：“青州，古爽鸠之虚。”“禹贡”为青州，周为齐国。”据明嘉靖《青州府志》载：“少昊爽鸠氏，帝少昊之司寇也，帝以鸟名命官，司寇主击盗贼故名。今昌乐营丘是也。”《续山东考古录》云：“古风质朴，以官名、人名为国名耳。”时营丘地，故曰：爽鸠国。

夏朝：《竹书纪年》载：“唐尧八十七年，初建十有二州……虞舜三十三年（公元前 2223 年），命禹摄位，遂复九州。”时营丘地由夏诸侯，季荊代爽鸠居之。《青州府志》载：

“季荊，虞夏诸侯，代爽鳩者，亦昌乐也。”禹贡海岱惟青州，淮淄其道。青州之域，古爽鳩地：有季荊（今昌乐县古城村）；斟郛（今安丘市杞城村）；斟灌（今寿光市斟灌村）；薄姑（今博兴县柳桥镇）；莒，古介根邑，莒故都（今青岛市城阳镇）；纪，（今江苏省赣榆县，鲁隐公元年迁寿光市纪台镇处），诸国地。”以上所见，即古青州地域之轮廓。《史记》司马迁曰：“禹后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夏朝时营丘地称季荊国。

商殷时代：昌乐营丘地，有逢伯陵氏封国。《路史》载：“逢伯陵，姜姓。炎帝后裔，太姜所出，始封于逢泽，后改封于齐。”明嘉靖《府志》载：“逢伯陵，姜氏，伯爵。汉书谓，汤时有逢公伯陵；齐乘曰，逢伯陵，商之诸侯封于齐；即晏婴对齐景公曰：逢伯陵因之是也。亦昌乐也。”可见营丘古城，自少昊时有：爽鳩氏始封国；夏朝有季荊氏代封国；商

朝继封逢国；至周，太公吕望封称齐国，谓古青州治所，周朝前计有一千五百余年的历史记载。

周朝：《竹书纪年》载：“帝辛（纣王）三十一年（公元前1123年）西伯（文王）治兵于毕，得吕尚为师。翌年，武王兴师伐纣克之。继命姜太公吕望东征。伐奄国五十，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逐莱人地入于齐。非鹰扬元勋，不足以弹压东方，故特封之营丘。”又载：“武王十三年（公元前1122年），巢伯来宾，逐大封诸侯。”《昌乐县志》载：“周武王十有三年夏四月，封尚父于齐，都营丘。按：营丘故城，即太公始封之地，历六世，始迁都临淄。”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载：“成王封外祖父太公吕望做齐侯，吕尚都营丘，山东省昌乐县。”司马迁《史记》曰：“太公封齐，兼五侯地。”即斟郛、斟灌、莒、薄姑、纪地。《青州府志》载：“周齐太公吕望、侯

爵。炎帝苗裔……佐禹平水土有功、赐姓曰姜，谓之吕侯，商末太公起鱼钓，为周文武师，号师尚父，佐武王以平殷乱，封于齐都营丘。……齐始封昌乐、再徙博兴、又迁临淄。传卅一世，为田氏所篡。太公传子丁公吕伋；伋传子己公吕德；德传子癸公吕慈母；慈母传子哀公吕不辰；纪侯谮之于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吕静，是为胡公；胡公徙都薄姑（今博兴县柳桥镇处）。齐哀公少弟吕山怨胡公，与其党袭杀胡公，而为献公；献公尽逐胡公子，徙都临淄。”嘉庆版《昌乐县志》载：“周厉王十有九年（公元前856年）齐哀公弟山，率营丘人袭杀胡公，而自立为献公，徙治临淄。”《竹书纪年》卷九周记载：“康王六年（公元前1072年），齐太公薨；康王十六年锡齐侯伋命。”（伋、姜太公之子，丁公吕伋。）又见清朝乾隆年间，礼部侍郎阎循观《西涧草堂诗集》“登木梁台”诗云：“层台冠西岭，云际

独攀登；沧海遥如带，沂山近可恐；地崩庚戌水，铭记太公陵；欲辩临淄误，返周亦缺徵。”并诗后如注云：“雍正八年，大水台崩，得古碣云，齐太公之墓，碣旋裂。”史料可见，仅姜太公一人，在昌乐县营丘，治国修政达五十年，相沿姜姓五世六侯，都治营丘称齐国，历时一百八十八年。并非始封临淄。

关于昌乐营丘与临淄营丘之争论，原错误出自魏朝酈道元《水经注》，误定营丘为临淄。后见清朝全祖望《全校水经柱》给予反驳云：“淄水出其前左营丘，误也。临淄城中虽然有丘（称葵丘），淄水迳南而北，非营绕之意。”又云：“周成王封师尚父于营丘，东就国，道宿行迟，莱侯与之争营丘。太公闻之，夜衣而行，至营丘。陵亦丘也；作者多以丘陵号曰缘陵。又去来差近，成言太公所封。考之春秋经书，诸侯城缘陵是也。”又据《山东古国考》云：“昌乐营丘属于莱夷国都。莱夷部族那有

不争之理。《潍县志》云：“商周潍县地属莱国。”可见，姜太公所争之营丘，并非临淄城，因为莱国与临淄相距甚远。《尔雅·释丘》载：“水出其前，洧丘；水出其后，沮丘；水出其右，正丘；水出其左，营丘；此以水在丘之前、后、左、右名之也。”民国四年版《辞海》解释：“洧丘，谓水在丘之前也（今金钺河）；沮丘，背水以为险也，沮同泄字（今官庄河）；正丘，水出其右，古人以南为正，故以西为右，则流不远，当止也，尔雅亦称沚丘。（原窦公渠上游河）。营丘，水出其左，（今白浪河）曰：营丘”。当时昌乐营丘，地处四河中央，故有城处脉中之说。其地形地貌完全与《尔雅》记载相符合，而临淄古今都不具备这一地理特征，只见淄河旁其左。今古皇城（古城村）东南隅数步有丘，今称石埠，长宽里许，因水土流失，今不甚高，标高63.1米。清朝翰林院学士、工部侍郎阎愉“营丘辩”文，肯定此石

埠为营丘之丘。今有金钺河流其古城前；东面有白浪河旁其左；北有官庄河背其后；古城西，窦公渠水出自古城西南“蛤蟆塘”，水自城西侧北流，由“皇城”后东折流入捎后官庄河，当时营丘四水萦绕，故名营丘。而酈道元只依水出其前左，牵强应和临淄地形，又言：“城对天齐渊，故有齐城之称”。释云：“天齐渊，是天之腹脐；漂瓦出木，记有“齐”字等”云。对临淄营丘因事附会，遗谬误于千载。唐朝颜师古早已考称：“昌乐营丘是旧营丘。”若有新营丘，临淄城不过是沿袭老营丘名而已。在清朝乾隆年间，据传有一次营丘之争的大辩论，最后乾隆御批昌乐县为“尚父初封地”。做为昌乐城中“保障坊”的匾额。至今残坊尚存。从太公封营丘至齐桓公改称缘陵，营丘名称历时又三百余年。加之周朝前一千五百年，营丘名称历时一千八百余年。

春秋战国时：营丘称缘陵。嘉庆版《昌乐

县志》载：“襄王六年春，诸侯城缘陵。按：缘陵齐邑，殆因营丘，缘陵而得名也。”《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载：缘陵即营陵，古城在今山东省昌乐县东南五十里”。《通志》云：禹“后裔，东楼公九世，成公迁缘陵。至文公又迁淳于（今安丘市杞城）”。《府志·封建表》载：周灵王廿三年（公元前594年），杞文公名‘益’，始迁淳于。”依此计算禹后裔东楼公，在缘陵称杞国，历时一百二十九年。嘉庆版《昌乐县志》载：“敬王时（公元前519年），孔子弟子名‘后处’，字子里者封此，唐追封为营陵伯。”

西汉时：汉高祖刘邦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封从兄刘泽为营陵侯，都治营陵。《史记》卷十八表云：“营陵侯刘泽，汉三年为郎中，击项羽；十年封从将军，击陈豨（音希）得王黄；为侯。与高祖疏亲刘氏，世为卫尉，封万二千户，汉高祖十一年，即营陵侯刘泽元

年。”从此缘陵始称营陵。营丘地自齐桓公元年称缘陵，至汉高祖十一年改称营陵，缘陵之称历时五百余年。西汉时，营陵首为北海郡治所。《后汉书·地理志》载：北海郡，景帝中元二年置，（公元前148年），户十二万五千，口五十九万三千一百五十九。领县二十六：营陵或曰营丘，莽曰北海亭。剧魁，侯国：莽曰上符。安丘。鞞、侯国。淳于。益，侯国。平寿。剧，侯国。都昌。平望、侯国。平的，侯国。斟，侯国。桑犊。平城，侯国。密乡，侯国。羊石，侯国。乐都，侯国。石乡，侯国。上乡，侯国。新城，侯国。成乡，侯国。胶阳，侯国。”以上共廿六侯国及县，西汉时侯国与县并存。新莽（王莽）天凤元年（公元14年）改营陵北海郡为北海亭。嘉庆版《昌乐县志》载：“建武四年（公元28年），伏恭字叔齐，为营陵侯。光和六年（公元189年）应劭为营陵县令。《后汉·郡国志》载：“北海国（治

剧县)，领十八城：剧、营陵、平寿、都昌、安丘、淳于、平昌、朱虚、东安平、高密、昌安、夷安、胶东、即墨、状武、下密、挺、观阳”。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北海国改为郡。魏太和六年（公元232年）北海郡改为国。三国青龙元年（公元233年）北海国改为郡，又营陵县地。”三国青龙元年后，营陵又为北海郡治所。《补三国疆域志》载：“北海郡领平寿、下密、胶东、即墨、都昌、观阳七县。”

晋朝、晋武帝司马炎泰始元年（公元265年），废魏立晋。此时营陵、剧县划归徐州部，琅琊国东莞郡。《晋太康地理志》载：“晋因汉制，营陵先属北海郡，至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分琅琊置东莞郡，营陵属之郡下。”《山东通志》云：“东莞郡统县八：营陵、朱虚、安丘、益、临朐、剧、广。剧、营陵属焉。”元康十年（公元300年），城阳之营陵等十一县为高密国。晋明帝太宁元年（公

元 232 年），秋八月，石虎陷青州、营陵、剧地入后赵，历时卅三年。晋安帝隆安三年（公元 399 年），慕容德陷青州、营陵、剧属南燕十年。南北朝刘宋明帝泰始五年（公元 469 年），营陵属胶州平昌郡。北齐承光元年春（公元 577 年），后周兴师灭齐，营陵、都昌两县属后周，历时廿七年。

隋朝：隋文帝杨坚，开皇三年（公元 585 年），北海郡为青州下。《山东通志》载：“隋北海郡（时始治益都），统县十：营丘、都昌……属之郡下。”又云：“隋开皇十六年，改曰营丘县，属北海郡，（治所始徙今潍坊市），大业八年废。唐武德初，于营丘县权置杞州，二年州废，复为营丘县，属潍州。八年省入北海。（今潍坊市）”。隋开皇十六年营陵始称营丘县，营陵之称历时近八百年。

（792 年）。

唐朝：《旧唐书·地理志》载：“武德二

年（公元619年），置潍州，领北海等十一县，析北海县置营丘县。武德六年（公元623年），惟留北海、营丘、下密三县，余并废。武德八年潍州废，乃省营丘、下密二县入北海县，五代因之。”

唐朝时：爽鸠、季荊、逢伯陵、姜太公开国之地营丘古城始废。古老的营丘，东方大邑，历经沧桑，几经沿革，逐渐演变为农村。今见营丘故城遗址附近，仅存古城村、营丘村、营丘河南村、城前村、古城店、城角头村等象征性村庄而矣。华都丽邑、昔日辉煌、已陷湮隐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但是，营丘古迹，历史之文明，却给齐鲁文献之邦，留下了光辉的史碑。

注：营丘之“丘”，明初倡儒学，为避孔丘之“丘”字，官令“丘”旁加阝，明后丘字为邱。故属同一字义。本文引

证困难，故尊重史料。诚望
读者见谅。

昌乐县汉代画像石墓简介

李学训

汉画像石，起源于西汉，流行东汉，是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死后，在墓室和享堂的石质材面上所刻的图画。其画面内容，构图方法，雕刻技巧等，是考察研究当时社会现实的真实资料，也是建筑和艺术史研究的极好素材，又是旅游开发的潜在资源。

昌乐县的画像石资料十分丰富，几乎每处乡镇都有发现。近几年来，根据国家“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工作方针，我们对其中的两座画像石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现分述如下：

其一，东肖汉画像石墓。位于县城以东约六华里，东肖村南约2华里的昌（乐）潍（坊）公路北侧。由群众挖土发现，昌乐镇东肖村民

委员会配合县文物管理所，进行了发掘保护。墓葬为东西向，由墓道、前室、后室共三部分组成。墓道在原土上挖成，作斜坡形，前后两室皆以石灰岩石建成，平顶、直壁、石板铺砌地面，总面积约30平方米。历史上曾经两次被盗，随葬品仅发现几枚腐朽的五铢钱。所幸的是画像石基本保存完好，有近百幅之多，满布于墓门、墓室四壁、立柱和封顶石。画像内容十分丰富，计有车骑出行、器械搏击、狩猎、杂技、耘锄、门阙、吊唁、献俘、门吏、男女近侍、迎谒、孔子见老子、伏羲女娲象、星象、龙车、仙人骑兽、骑马、青龙、白虎、朱雀、灵蛇、长臂猿、比目鱼、卧羊、飞燕、云气、力士等等。几乎包括了人类社会生活以及神话、迷信的各个方面。

其中的一些作品，有较强的地方和时代特色。如描写墓主人生前田猎玩乐的狩猎图，纵0.3米，横3.01米，刻有众多的猎者纵犬、持

毕、挺勾、逐兽、抬兽以及牛车和犬奔、鸟飞、野兽惊恐躲藏的画面，虽不壮观，却给人十分真实的感觉。尤其是在狩猎现场的一隅，立一高杆，杆顶一猴正面蹲坐，形态滑稽可笑，给人以较强的幽默之感；再如耘锄图，田间一株大树，树下拴系一马，一人持锄弯腰劳作。树下所系之马，无疑是锄者的座骑，而骑马的锄者，自然不是百姓。它体现的很可能是墓主人的一种闲情逸致，也可能是对当时社会所流行的隐士生活的赞美和向往，或者是墓主人生前就有过那么一段隐士般的生活，这付画面应是其形象的写照；又如器械搏击图，纵0.3米、横1.1米，其上刻画面两组。一组的主体画面为一武士与一裸体小儿搏击，作势施威，枪尖扭在一起，似闻撞击之声。一组为一戴斜顶冠的武士与一冠饰羽毛，褒衣肥裙，袖口裙边装饰缨穗的人斗剑。后者躬步倾体，剑锋直指前者的眉尖，前者面对剑锋，身略后仰，一手举

剑，一手挥勾力拨剑锋。后者的装束与前者不同，类似后期妇女的装扮，而动作也显飘逸潇洒，刀光剑影中透出女子那特有的灵秀之气，因此，不能排除后者是一女子。果如此，这应是中国妇女较早的习武格斗的形象记载，弥足珍贵；后室北壁最下一石，纵0.3米、横3.01米，刻画的是几组男女侍者，分别侍奉主人的场面。其中的一组画面，中间主人端坐于榻，右边三位侍者面向主人，二躬立一跪立，左边一人跪立，一人正回首观望一双男女相拥而吻。其场面饶有兴味，不能不说是画像石中的罕有作品；后室东立柱西侧下部，刻一裸体、蹲坐、面目狰狞的男子，一只手上举，一只手触摸生殖器，这很可能是属于生殖崇拜主题的作品，同样十分罕有和耐人寻味；后室中立柱南侧的画像，其上是一蹲坐的裸体力士，用头和双手共同托举建筑物的椽斗，中间是一十字形尖状物，下部是一单足立地形状似鸽的鸟，十字尖

状物一尖抵于力士肛门，一尖抵于鸟首，力士面露吃力表情。想象奇特，造型诡异，是一种巫术行为？或是对某一神灵的崇拜？这有待我们作进一步的研究；特别应该提及的是，墓葬的车骑出行图，分布于前室和后室，总共近二十幅之多，有的轻车简从，有的有较多的车骑随行，有的却是浩浩荡荡，随车、骑吏、伍伯俱全。以主车而言，有驾一马，驾二马和驾四马之别。根据《续汉书、舆服志》汉代百官乘舆制度的规定，这或许就是墓主人不断升迁从而不断更换车马仪仗的为官史。除此，在后室门楣正中的方形石上，还有“此中人马皆食天仓”的铭刻，类似刻铭，在省内其它地区也有零星发现。如安丘市发现的“此上人马皆上食于天仓”的画像石，曲阜徐家村发现的“龙神马牛皆食大仓”的画像石，以及肥城北大留村发现的“此人马食大山仓”的画像石等。对比之下，此墓的刻文最为完整无缺和通俗易懂，

因而也是难得的语言文字标本。

这座墓的雕刻技法，除一例为山东地区早期常见的粗阴线刻外，余者皆为凹面阴刻和减地浅浮雕两种技法。其特征既保留了早期风格的粗犷古拙，又出现了一些线条流畅、圆润、富于变化的较成熟的作品。在画面布局上，简约疏朗，缺少后期盛行的细腻繁缛、富丽堂皇的作品。在装饰上，以垂幛纹、三角纹和一种填饰斜线的凹弦纹为主，极少后期繁杂的组合式花纹装饰。这一切都说明这座墓的年代，应处于画像石发展阶段的中期左右，其时代应在东汉中期上下。

其二，王家埠汉画像石墓。位于平原镇王家埠村东约500米的埠岭之上，原有高大的椭圆形封土，历经多年的风剥雨蚀和群众取土，使部分墓室暴露在外，为了妥善保护这一珍贵文物，经上级批准，由昌乐县文物管理所于1994年春季对其进行了抢救发掘。

发掘证明，该墓曾经三次严重破坏。一次是从封土顶部下挖，直接打碎墓室的部分封顶石进入墓内，从盗坑内回填土的紧密度分析，此次盗掘的时间当在清代之前；一次是从封土的一侧打洞，寻找到墓室后，将墓室的一侧墙壁打通而进入墓室，这是最典型的盗墓手段，其时间当在建国前夕；第三次是在建国之后，当地群众打通墓室，利用未破坏的前室储存红薯种。因而发掘之时，基本未见随葬物品。

墓葬为东西方向，墓门向西，由墓道、甬道、墓室和回廊组成，总面积约 80 多平方米。墓道平直，长 10 米、宽 1.6 米、残深 1 米左右，其用途同于地面之上通向宅院的道路；甬道为二进式，作成两个相连接的椭圆形，相接处为束腰状，此类同于宅院的天井；墓室可分前室和后室，皆为穹隆顶，前室当为厅堂，宽敞明亮，后室则系起居之所，略显低矮。两室全部由长 2 米，宽 1 米左右的石灰岩片石扣合

而成，十分精巧牢固；回廊为平顶，围绕后室的南北东三面并与前室通连，多用于盛放随葬品，功能类似于现代建筑的储藏室。此种结构的墓葬，在山东地区发现极少，在我们潍坊地区则仅此一例。

画像石主要分布在墓室四壁和封顶石上面。包括车马出行、迎谒、庖厨、宴饮、狩猎、鸟兽率舞、铺首衔环、游鱼、连体龙纹和多种图案组合而成的花边装饰等多种图象，十分精美绝伦，给人以神秘肃严，富丽堂皇之感。如车骑出行图，其画面共有两幅，一幅为行进之中的队列，在长近3米的画面上刻有五位骑者，四辆马车，间次行进，十分壮观；另一幅是描绘出行中发生的故事。开首为一组打斗场面，画面为一持盾握刀的可能是图谋不轨之人，一手举盾挡住前面军卒刺来的长矛，另一手挥刀拨开后面军卒刺来的矛尖。其后依次是两军卒各自持弓挥刀大步向前，一军卒虽非大步但却

是挽弓搭箭待发，其急于搏杀的心态一目了然。再后是两位肩扛长矛的军卒和两辆马车并四位骑吏，他们均是神情泰然，给人以稳操胜券之感；又如迎谒图，画面自左至右分为两组，一组为接待方，刻画一人抡锤击鼓，一人身体弯成九十多度迎接；另一组当是出行者，依次为两骑吏、两马车、又一骑吏、两马车，最后是一肩扛长矛的军卒。迎接者谦敬真诚，巡行者受之无愧，这是封建社会礼仪制度的形象体现；再如鸟兽率舞图和狩猎图，前者在长近5米、宽1米左右的平面上刻画出奔挪腾跃，形态各异的龙、虎、凤、鸟等珍禽异兽近百个，此种祥瑞形象，是东汉时期神道思想观念的典型反映，是广为流传的画像题材；后者在近四个平方米的画面，刻画出了一个白云之下，山原之中的非常壮观的狩猎场景，犬奔鹰飞，刀光剑影，野兽争先躲藏。在这幅画中，作者似乎特别突出了猎犬的形象，前面的四条犬齐头扑

向一只无处藏身的野兽，中间的几条犬也飞身跃起扑向已躲进洞中的野兔，后面还有许多条犬往前狂奔，由于画面的限制或是艺人匠心，有一些犬还只是探出半截身体，象征其后还有许多。象这样形象逼真且颇具劲道的多犬狩猎画像，在其它地区也是不多见的；特别应指出的是，前墓室两块并列的平面线雕画像，其最下一层的画面依次为庖厨、宴饮、乐舞和归府，四幅内容连贯。庖厨图中，厨人们缚牛、捉猪、逮鸡、用滑轮汲水，用大缸酿酒，肉杆上挂满了鸡、鸭、鱼、肉，厨人们有的掌刀，有的烹调，架子上放满了烹调好的食物；紧接是宴饮，侍者往来，从厨房端来酒饭，供主人宴饮。主人共有三位，一男二女，分别端坐，两侧有侍者恭候；紧接下来是乐舞，舞伎们或倒立，或舞动长袖，生动优美，周围是主人和客人观赏；最后一幅是外出的人吃好玩好之后，正走在回家的路上。路的终端为高台飞檐的庭院，大门

半敞，一妇人端立门槛，似乎是等候外出者归来。这一连串的画面，描写的极有可能是主人外出的较完整的过程。果如此，这应是连环画发展进程中的最早作品，比欧洲连环画产生的时间，要早一千多年。

这座画像石墓采用的是平面线雕和减地浅浮雕技法，线条娴熟流畅，形象质朴浑厚，是典型的东汉晚期风格；在内容的体现和构图方面，细腻繁缛的大型画面，也是东汉晚期的典型特征；而墓门门楣的蔓草纹装饰和多种图案组合而成的边框装饰，更是东汉晚期画像石的独有现象。因而其时代当在东汉晚期甚至稍后一些。至于这座墓葬的主人及其官秩，有待于今后进一步探讨。

总之，这两座汉画像石墓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不同时期汉石刻画的极具特征的资料，除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外，对我们研究考察东汉时期，封建官僚地主的社会生活，风俗信仰

甚至建筑艺术特色等，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有关朱翰仪宾的传说及史料

高玉忠 于令珠

朱翰仪宾⁽¹⁾姓高名察，是明朝万历年间太学士⁽²⁾，有关他本人和涉及到他的传说不少。诸如：仪宾的来历、新淦县主⁽³⁾“借刀”除民害、万历赠石、高家失马等，至今已相传四百余载。

据《朱翰高氏家谱》所载：高家原籍安徽濠泗⁽⁴⁾，明永乐年间⁽⁵⁾迁至山东昌乐南八十余里的周韩里。高姓分支五世祖高荣（号古田）借明朝皇帝朱姓，自己又在京翰林院任职主考官，故将周韩里改名为朱翰。

高察是朱翰高家五世祖高科之三子，明万历年间被青州衡王⁽⁶⁾选为仪宾，成为王室之婿。万历皇帝对其赏赐丰厚，从此高家声势丕振，

后嗣兴旺，成为名门望族，家业在相邻诸县中堪称富室之首。

至于青州衡王府为什么在众多有功名的年轻人中单单选中高察为仪宾，在史料中毫无记载。只有从带有传奇色彩的民间传说中得知一二。

（一）朱翰仪宾的来历

这是一个极为巧合的故事。相传五世祖高科有三子，都在书房读书，长子高客、次子高宿都一般平平，唯独三子高察自幼天资聪颖，才思敏捷，身材魁梧，只是面目黑了些。他虽无潘安之貌，却有子建之才，且胸怀不高中不娶妻室，高中为国效力的大志。高科深知仕途艰难，对其要求甚严，高察谨遵师训，日夜苦读，常言道：十载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他不负父望，十九岁中秀才，二十二岁中举人，明万历三年二十五岁的高察得入国子监

深造，他进士待取，功名在握，就在此时，正值青州衡王三女儿新淦年进妙龄，衡王要为其选一快婿。

衡王府乃皇室府第，是往来无俗客，亲朋无白丁。无功名和已有妻室者不得入选，高察一是太学士，二来未婚娶，自然被衡王府列入入选之列。

再说衡王的小女新淦，自幼生在王府，天生丽质，才华出众又机智过人，平日描龙绣凤，饱读诗书，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对人生颇有见解。但其秉性倔强，自己认准的事八匹马子也拉不回来。选女婿是件终身大事，自然有她自己的主张，就是健壮第一，相貌功名次之。为啥？因为大姐二姐当初都选了文弱书生做女婿，结果年轻轻的都守了寡，为此两个姐姐时常告诫她：“三妹啊，你选女婿的时候可不要和俺俩那样，不管壮实不壮实，只看小白脸长的俊，到头来象荷花芽子样，经不起折腾，风

一吹就断，落的俺俩是上不够天下不着地，刚过三十就守了空房……”。新淦听后心想：也是呢，纵有那高官厚禄紫蟒加身，腰胯玉带足蹬朝靴，日食珍馐奴婢千百，一下子半路上去了，到头来还不是一梦黄粱，后半辈子还不是也和两个姐姐一样苦守孤灯……。古语说：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因此拿定了主意：丑俊在后壮实在前。

俗话说：好找人易，人找好难。眨眼功夫选期已到，这天高察早起打扮一番。骑马直奔衡王府，到了中午用饭时分，高察坐下环视了一周，十来个入选的人，个个都是文质彬彬衣着华丽的白面书生，唯独自己长的又粗又黑，穿戴也一般，相比之下俨象个庄户汉子，真是天上地下，自己一下子就撒了气。又一想：选中是没啥希望了，反正来一回，在王府吃顿好饭也是件快事。吃饭了，那些入选的书生是斯斯文文，你谦我让，拿起筷子来就象怕吓着样，

吃一口停一停，生怕有损自己的身份。高察呢，不管三七二十一，大口吃菜大碗喝酒，一桌子菜几乎被他吃了个净，两坛子酒被他喝了个光，一摞饼吃了个完，惹的周围人你嗤我笑，目不转睛地看他，有的低声嘲笑说：“饿煞的鬼还想当仪宾，纯来找饭吃的……”。就在高察大吃大喝之际，被在帘子后面的三姐妹看了个仔细。新淦盯了英挺突出的高察一回问：“姐姐，您看那个长相魁梧能吃能喝黑呼呼的怎么样”？两个姐姐也早已注意到高察那狼吞虎咽的样儿，说：“行，能吃能喝就壮实，中中中！黑点怕啥各人的皮色”。新淦听后点了点头：“嗯，就选他”。这才是：壮实的小伙黑也好，白面馍馍冷也香。仨人又看了一回就回楼去了。

饭后管家进厅说：“诸位入选的相公，饭罢无事可各自请便，选中者自有喜信报到府上”。那些白面书生个个做着美梦乐哈哈地散

去，唯有高察怏怏不快而归。

时过半月，突然报喜的快马来到朱翰街高家大门前。说是来报信的，可就是不下马，高父和高母一看是讨赏钱的，一连拿了三次赏钱，报信的才下马拱手说：“恭喜高老太爷，贵府太学士高察被衡王府选中为婿了，现有喜书，请老太爷过目”。高科接过喜信一看果然不假，真是云彩里掉下个媳妇来——喜从天降。恣的老俩直流眼泪不知说什么好，忙不迭的准备完婚事宜。

完婚这天更是热闹，高家掌灯结彩，披红挂绿。送亲队伍是仪仗在前吹吹打打，鼓乐喧天，那绣着龙凤的八抬大轿前护后拥，火红彩球迎风摆，五色彩穗随轿颤，后面跟着十几辆拉嫁妆的大车。因为新淦是皇帝的姑母，皇上所赐的宫婢、卫士数十人，抬着黄金百两，白银千两，布帛数百匹，配戴银鞍金镫的千里驹两匹，也都随着一块到来，送亲队伍长达一里，

浩浩荡荡地进了朱翰街。看热闹的人把朱翰街挤了个水泄不通。整个高家大院是喜气洋洋，鞭炮齐鸣，你来我往熙熙攘攘。青州所属诸县县令也备以厚礼前来高家贺喜，高家是里里外外接待忙的不可开交，喜事一直持续了十多天才结束，从此高家名声大振。高察就这么巧的一顿饭吃成了衡王府的乘龙快婿，娶了个如花似玉的千金小姐做媳妇。这才是有心栽花花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呢。

后来，“朱翰的仪宾吃出来的”这句话成了当地的一句歇后语。

《朱翰高氏家谱》载：万历五年⁽⁷⁾皇帝下诏⁽⁸⁾（原文为竖式）

奉：

天成运

皇帝制曰人之大伦莫先於夫妇礼之大节莫重于婚姻此古之通义也今特命尔高察为亚中大夫⁽⁹⁾

宗人府仪宾配自新淦县主尔尚
崇德敦礼克慎威仪毋怠毋骄用

昭宠命钦哉

诰命

万历五年十二月初二日

据《高氏家谱》载及高永和高祖成等老人讲述：高察成了衡王仪宾之后，加上皇帝的赏赐，高家一跃成为富室，开始大兴土木：盖有高大的楼门，门楣上横挂一金字大匾，门外两侧各有五花石狮子一个，高高的捧斗旗杆，上马石等。进门是宽大的影壁，中间镶着陶土烧制的浮雕麒麟，四角镶云字五彩琉璃瓦，上帽盖以红绿色琉璃瓦，长约十米，高约五米，厚约八十公分。（据考证，以陶土烧制的浮雕麒麟影壁全国极为罕见），绕过影壁是二门口，穿过二门进入正房院子，盖有一拉五间二排高台屋，各排台屋两侧有厢房数间，供下人居住，整个建筑坐北朝南院墙高大，总占地面积约十

市亩多；从高家大院向西约一百六十米是高家花园，因去花园有一南北大街相隔，新淦不愿穿街而过，命下人搭一过街天桥，供她和高母去花园之用。园内有假山、太湖石⁽¹⁰⁾、荷花池，各种奇花异草，一年四季花开不断，并有专人管理，总占地面积约三十市亩，花园西北角盖一楼阁，乃新淦休息纳凉之所；其他建筑有：高家祠堂、刘山庙、关帝庙、菩萨庙内有魁星阁、七星台、河东马趟子⁽¹¹⁾、还有营丘河南城前村一座三层楼⁽¹²⁾。高家大院整体仿明宫建造，气势之宏伟，令人叹为观止⁽¹³⁾。

（二）新淦县主“借刀”除民害

关于仪宾之妻新淦的记载极少，除《朱翰高氏家谱》中皇上下诏封为“新淦县主”及简短几句记述外，其他极难考据。只有从新淦县主“借刀”除民害这一富有戏剧色彩的民间传说中了解其大概。

相传新淦和高察成亲之后，尊长爱幼十分贤惠，待人宽厚且掌管有方，小两口是你亲我爱十分和谐。只有一件事叫她透不过气来。

朱翰镇北有一寺庙叫北寺，寺内近二十个和尚，依仗着历代皇上偏袒偏护，越法规败世俗，强索民财鱼肉乡里，欺男霸女无恶不作。每逢年节强到各庄“化缘”，化什么香火钱、修缮钱、塑神钱、铺路钱、换衣钱……，交迟了就到庄里见人就连骂带打，吓的百姓一听说和尚进庄就赶急关门锁户。自己庙地庄稼长得不好，上坡看看谁家地里庄稼长的好，割倒就成了他们的。更有甚者，几年来竟一连逼死十条人命，有二十多户人家被逼的妻离子散远去他乡却无人敢管。这桩桩件件新淦是两耳听得满满的，她心想：这帮恶和尚一日不除，朱翰街怎得一日安宁。

今年麦收，高家雇短工割麦子，除管饭付工钱外，每人给一个新苇笠。和尚一看短工都

被高家雇去，第二天大早一上市就声言：给北寺割麦子的干一天付两天的工钱，还给每人搭上伞，这一来短工去了北寺，新淦知道后，吩咐下人：“凡来高家割麦子的每天一钱银子”。结果又把短工全拉到了高家，和尚一看无力与高家抗争，就合伙来到高家门前又骂又砸。上马石上拉屎，朝着石狮子尿尿，新淦知道后出来说：“国有国法，寺有寺规，你们既已出家应谨守寺规，诵经念佛以善为本，非但如此，反而到我高家门前又骂又砸，出言污秽辱我高家，是何道理！”恶习成性的和尚那里肯听：

“嗨！青州小妮子也敢管起我们来啦，你只能被窝里管你那黑汉子，这么些人你能管得了吗？县主是个啥官？皇姑又咋啦，敢动这些人们一根毫毛叫你高家过不得，也不摸摸你脖子上长着几个头，咱没银子有镰，走！到高家地里割麦子去”！说罢扬长而去。新淦气地骂了一句：

“秃驴！我倒要看看你们脖子上长着几个头！”

官管不了的民来管，治不了你们这伙恶种我就不姓朱”！

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金枝玉叶，回到屋里气的是黄鼻子黄脸，心想：受到皇封的都敢欺负，何况老百姓。丫环在一旁说：“小姐，难道官不敢管皇上也不敢管吗”？新淦一听说：“对！进京见皇上去”！

翌日，新淦叫人备好轿车，丫环陪同到了青州娘家，说要进京走亲戚，衡王听说又派了十几个卫士护送她到了京城。万历皇帝听说山东姑母远道而来，退朝后忙来拜见，相互见过大礼后落座，万历皇帝问：“姑母远道来京何事”？新淦直接了当的说了朱翰北寺和尚的所作所为，仗势欺负婆家。万历听后心想：开国始祖年轻时曾当过和尚，终前又有遗训：天下和尚除反叛朝廷，杀人放火罪大恶极者严惩外，其他一律网开三面，历代都无违训者。再者只是听姑母口头上说，也是些动不着朝政的小事，

便毫不思索地说：“罢了罢了”（意思是算了）。新淦思维敏捷，立即想到罢字和耙字同音，处治和尚的办法。马上双膝跪地：“谢皇上明示”。万历皇帝慌忙扶起，他那里想到新淦会巧借“罢”字作文章，更不知道庄户人家的耙除了耙地还能耙人。万历走后新淦又住了几日便返回朱翰。

新淦回来后不久就一切准备就绪，这天，命所有下人卫士一齐出动，在北寺前掘了一条沟，命卫士将北寺里十六个作恶多端的和尚五花大绑起来，赶出寺门推进沟里，土一直埋到脖子，套好马子拴上耙，新淦说了声：“耙”！眨巴眼的功夫就把这些恶和尚耙的脑浆迸裂见阎王去了。

新淦县主耙死了十六个和尚，一下子轰动了青州府各县，十几个寺里的住持联络起来到县里省里告状，县令和道台大人一听是皇姑所为，都推说管不了，心里却暗暗庆兴：今才是

铜头碰上铁刷子，善恶到头终有报哩。每县都有这么个县主就好了。住持们一看他们推开不管，又掰伙到了京城大理司告状，大理司一听无法再推只好受理。上早朝时面奏皇上：山东青州衡王三女不知何故一下子耙死了朱翰北寺的十六个和尚……”。万历皇帝一听感到此案关系重大，命大理司火速派人到山东朱翰查明此事。大理司的人来到朱翰见了新淦县主，新淦说：“这些和尚横行霸道无恶不作，祸害一方，一连逼死十条人命竟无人敢管，难道只准他们作恶就不准我除害？！我事出无奈才出此下策，又有何错？再说，这些和尚所作所为万岁早已知道，是他明示我耙了，我才回来按皇上的旨意耙了这些恶和尚的，不信你们回京问我侄儿皇上去”！来人一听吓的连大气也不敢喘，只好乖乖地回京逐级回奏万岁爷。万历听后，一来是这些和尚确实作恶多端十恶难赦，二来是自家姑母所为，又是为民除害，常言说：

民安君不慌嘛，是为了大明社稷安定，也怨自己没想到出言不慎让姑母借着“罢”字作了文章，只好说：“新淦县主为了大明社稷除一方祸害，耙了就罢了吧”。一场轰动朝野耙死十六个和尚的人命大案，就这样不了了之。

祸害被除，寺庙被废，百姓拍手称快，朱翰一带的村庄燃鞭放炮三日以示庆贺。百姓再也不用提心吊胆过日子了。

新淦县主敢于除恶扬善，扶贫济寡又宽厚待人，其威望越来越高。四百多年过去了，新淦县主“借刀”除民害的故事至今还在昌乐南部流传着。

据《朱翰高氏家谱》载：高察共有一妻四妾十二子，原配新淦县主为其生二子，她的后代不乏有中秀才、举人、进士者，并受到当时朝廷的重用⁽¹⁴⁾。她辞世后葬于高家祖莹（号称仪宾林，后人叫白杨林）。

附注：

(1) 仪宾：明朝皇帝的女婿称附马，王的女婿称仪宾。

(2) 太学士：即太学生，明代以后不设太学只有国子监（即在京国办学校），在国子监读书者称太学生或称太学士。

(3) 新淦县主：新淦是衡王三女儿的名字。县主：明朝皇帝的女儿称公主，王的女儿称县主。

(4) 濠泗：今安徽凤阳一带。

(5) 即公元1403年。

(6) 衡王：是明世宗嘉靖皇帝的叔伯弟兄，他女儿安辈份是神宗万历的姑母。

(7) 即公元1577年。

(8) 此诏原文载《朱翰高氏家谱》附录，后人将此文刻碑立于朱翰街。“文革”期间被毁。

(9) 亚中大夫：明时有上大夫、中大夫、

下大夫，不够中大夫者称亚大夫，是皇上封的无实权的虚衔或功名衔。（封号）。

（10）此石是明万历皇帝赐给仪宾的。

“文革”期间被毁。

（11）马趟子：即遛马、跑马的专门场地。

（12）此楼是新淦县主嫁到朱翰后，见营丘（河头）河南城前景色秀丽，盖一座三层楼（当地叫明楼）作为别墅。新淦死后由其长子继承。（现已拆成二层）。

（13）有关高察家整个建筑布局，详见朱翰家谱中高家宅舍平面图。

（14）见《朱翰高氏家谱》中载《县志》笃行传、孝友传、文学传等。

封面设计:徐竟成

工本费:10.00元